

哀從何來——從〈八哀詩〉 看宋人學杜蹊徑與詩史交涉*

廖美玉**

摘 要

杜甫善寫人，尤善寫時人，以「不落俗套」的表現手法，隨人即事，每多創體。大曆元年作〈八哀詩〉，以詩為時賢作傳，關涉個人生命書寫與國勢興衰。宋人嗣作，王禹偁有《五代史闕文》，又作〈懷賢詩〉三首、〈五哀詩〉以哀五代入宋的王佐才；司馬光有《資治通鑑》，又作〈五哀詩〉以哀負大才而困於讒以致云亡殄瘁者，都可謂別出蹊徑，也都關乎詩人哀思與詩史交涉。宋室南渡，詮釋〈八哀詩〉者，以為「可以表裡《雅》、《頌》」、「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有「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意。本文以杜甫〈八哀詩〉為典範，梳理宋人嗣作，關注從盛唐到北宋盛世的君臣關係，兼及宋人學杜蹊徑與詩史交涉的討論。

關鍵詞：群傳、哀體、學杜、君臣、詩史

* 本論文為特稿，為示尊重作者，除基本排版調整，論文將不依本學報體例做出更動。

** 國立成功大學、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The Song Poets' Emulation of Du Fu and Their Negotiation with Poetic History - A Study of the "Eight Laments"

Liao, Mei-Yu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Feng Chia University

Abstract

Du Fu excelled at portraying contemporaries through an "unconventional" style that responded flexibly to events and often produced formal innovation. In 766 he composed the "Eight Laments" (*Ba'ai shi*), poetic biographies of eminent contemporaries, intertwining personal life-writing with reflections on dynastic rise and decline. Song poets extended this model. Wang Yucheng, author of the *Suppleme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wrote Five Laments mourning statesmen lost in dynastic transition. Sima Guang, compiler of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ance*, likewise composed *Five Laments* commemorating talented men destroyed by slander. These works adapt Du Fu's paradigm by combining personal grief with poetic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relocation, commentators elevated the "Eight Laments" as poems comparable to the *Book of Songs* and Sima Qian's encomia. This study traces Song continuations of the form, examining shifting constructions of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and the poets' simultaneous emulation of Du Fu and negotiation with poetic history.

Keywords: Collective Biography, Lament Genre, Emulation of Du Fu,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Poetic Historiography

哀從何來——從〈八哀詩〉 看宋人學杜蹊徑與詩史交涉

廖美玉

一、前言

史載唐太宗李世民（598-649，626 即位）「銳情經術」，召名儒「與議天下事」、「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¹成為治世明君。孔穎達（574-648）疏《毛詩正義》，乃以據事直陳、無有嫌懼為尚，提出「風、雅之詩，緣政而作」的詩學主張，直指詩人「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歸結出「詩人救世」，²直接涉入王政、治道。太宗又積極修史，兼以科舉取士，使歷史撰述、經典詮釋、類書知識與詩賦創作並臻興盛。影響所及，士人積極求仕，甘入彀中，³多匡救時弊之心，詩風為之改變。

杜甫（712-770）以遠祖杜預（222-285）的事功與學問為家族典範，⁴以詩為「家事」，⁵善寫人，尤善寫時人，又善於將多。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 在位）天寶五載（746），杜甫在長安，有〈飲中八仙歌〉與〈醉時歌〉為盛唐京城酒徒寫真。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亂起，從繁華盛世到風雨動盪，可謂興衰在眼。肅宗李亨（711-

¹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儒學上》（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 198，頁 5636。

²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卷 1，頁 16-17。

³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記太宗「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述進士上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 1，頁 1578。

⁴ 廖美玉：〈杜甫家族記憶中的兩性典範與生存感知——兼論父黨、母黨與妻黨的大家族觀〉，《成大中文學報》第 44 期（2014 年 3 月），頁 1-42。

⁵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宗武生日》（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卷 17，頁 1477。

762，756 即位）乾元 2 年（759），在秦州以〈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成為「詩史」的指標。⁶大曆元年（766）旅居夔州（今重慶奉節），距安史之亂已逾十年，喪亂、流離與處邊陲的百感交集，有詩四百多首。尤以連章鉅作〈八哀詩〉為「大臣」寫真，跳脫朝廷懲處的拘限，盛衰死生一瞬的詭譎時局變化，無法忽視也掙脫不了的時事網絡，具現個人與時代交織的跌宕一生與國勢盛衰，深切反思治亂與君臣、戰爭與蒼生等議題，有待「知我者」⁷的更多回應。

唐宋連言，有承有創。唐宋士人同為政治參與的主力，又都能詩，唐宋詩歌與詩學的傳承、開創與轉型，是一個被廣泛注意，極具魅力但難度依然很大的課題。川合康三〈唐宋詩學的系統樹〉具體以唐宋文學的例證，闡述「系統樹」有忽略文學多樣性與斷裂點的弊端。⁸建構文學系統樹的複雜性，遠非我們所能想像。本文聚焦在如何以嗣作、擬體向原創致敬與對話，在文本揀擇上，以杜甫〈八哀詩〉為典範，經歷朝代更迭頻繁的五代十國（907-979），而有王禹偁（954-1001）嗣作〈五哀詩〉，身處北宋治世的司馬光（1019-1086）續作〈五哀詩〉，既有傳襲又是各闢蹊徑。影響所及，南宋讀者對杜甫〈八哀詩〉的闡釋更見淋漓。此外，王禹偁有《五代史闕文》，司馬光有《資治通鑑》，為詩／史之間的界線與交涉，提供了參照與討論文本。三組詩從安史之亂到北宋盛世，歷經三百多年，呈現唐宋對人事／時事／史事的記憶與思考，可資考察歷史記憶的形成、轉變與開展，確認〈八哀詩〉在詩學史與歷史上的地位，兼以探索君臣關係等論題。

⁶ 唐·孟棻：《本事詩·高逸第三》，收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上冊（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頁 14-15。

⁷ 〈同元使君春陵行〉結語「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序〉稱「簡知我者，不必寄元」，展現高度的傾心並尋求更多的「知我者」。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9，頁 1691。

⁸ 川合康三：〈唐宋詩學的系統樹〉，《成大中文學報》第 90 期（2025 年 9 月），頁 1-20。

二、原「哀」：杜甫〈八哀詩〉的創意與宋人響應

漢·王充論孔子作《春秋》的創意：「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⁹《春秋》的褒貶賞誅，來自不為史記所拘限的精湛眇思。杜甫兼具士人、詩人與曾具官僚身分，親歷盛衰，世路干戈，目睹戰爭的慘烈，始終保持內在的強烈理想性，對時事與歷史的高度關注和反思能力，兼擅日常生動與嚴謹深刻的詩歌語言表達能力，掌握並同理各種不同情境，不斷思索未來的走向，深具開創性。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即論證杜甫「屬於中唐思想中變動的一面」、「屬於唐宋之際思想巨變的開端部分」。¹⁰杜甫〈八哀詩〉更以長篇連章，不厭其煩地寫下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將經史傳述與現實經歷相互對應，在個人際遇中看到當代與未來，形成多重對話關係，有其獨特的時空情境。

（一）斯時斯地：大曆元年杜甫在夔州的凝思與求索

陸機（261-303）〈文賦〉論創作時的考義選辭，貴在「罄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¹¹不為外物所擾，方能有超於眾人思慮的自得。屈原忠而被謗，〈離騷〉有「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¹²雖遭放逐而永不放棄自我理念的追尋。杜甫於安史亂後離京，由秦入蜀，寓居成都草堂將近四年，代宗李豫（726-779，762即位）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卒，五月即攜家離蜀東下。大曆元年（766）夏初移居夔州，因都督柏茂林相助，有柑林、稻田，「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宜」，過著相對安定的農耕生活，辨識資源，細數物產，以詩記錄日常家務與活動細節，彷彿已是歸田的「平居」樣態。而夔州的封閉性與邊陲位置，更清楚感受到與家園、故舊、朝廷的疏遠隔絕，如何看見、呈現自己的存在意義？顯然更為澎湃洶湧而難以平抑，也從沒停止過對外界遞出訊息。

⁹ 漢·王充：《論衡·超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13，頁136。

¹⁰ 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卷第1期（1998年3月），頁1-43。

¹¹ 晉·陸機撰，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頁43。

¹² 清·蔣驥撰：《山帶閣注楚辭》（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卷1，頁41。

杜甫夔州詩涉及的人生際遇、時局巨變與今人古人，綿密交織成深層次的互動與對話，展現在對歷史遺跡的流連歎惋，對時事有更細緻的記憶與更深刻思考。學者的論述，如方瑜綜論杜甫夔州詩對時政的批判，「最引以為遺憾者乃當政者用人不明，真正人才不得見用」；¹³程千帆指出夔州的長篇排律和聯章詩「標志著作者對這些詩體的運用達到了全新境界」、「體現著由現在回溯過去的反省」；¹⁴美國學者潘格瑞指出夔州時期的杜甫，既是「詩人史家」，也是「詩人地理學家」：

他前所未見地詳細描繪了這些臨時棲身處所的獨特山水、文化和歷史，它們在他的作品集中構成獨特的存在，如果他的詩集是一個獨立的帝國，那麼這些詩就好像是一些半獨立的省份一樣。¹⁵

杜甫心繫時局，渴望亂平民安。如〈遣懷〉追憶昔游，玄宗開邊以致「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感歎「亂離朋友盡」、「獨在天一隅」；〈壯游〉自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結語「群凶逆未定，側佇英俊翔」，十餘年的戰亂流離，長繫於懷。尤以〈秋興八首〉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臨老寓夔，懷鄉戀闕，慨往傷今，夔府長安今昔之感特深。¹⁶盧世淮（1588-1653）論〈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

乃子美既竭心思，復送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算運籌，為古人寫像。一腔血悃，萬遍水磨，不唯不可輕議，抑且不可輕讀，養氣滌腸，方能領略。¹⁷

更在〈白帝城最高樓〉寫下「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以歌行入律，奇氣冪兀。遠離以朝廷為核心的京城精英文化，身處僻遠孤子的局促，依然對時事保

¹³ 方瑜：《杜甫夔州詩析論》（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頁125-126。

¹⁴ 程千帆：〈晚年：回憶和反省——讀杜甫在夔州的長篇排律和聯章詩札記〉，收入程千帆、莫礪鋒、張宏生：《被開拓的詩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217-234。

¹⁵ 〔美〕潘格瑞：〈歷史的渠道：杜甫夔州詩的紀念與溝通〉，收入田曉菲主編，劉倩等譯：《九家讀杜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頁72-99。

¹⁶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遣懷》，卷16，頁1447-1450；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壯游》，卷16，頁1438-1447；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秋興八首》，卷17，頁1484-1499。

¹⁷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第9冊，頁9116。

有持續關注與思考，也因時空的特殊性而別有一種孤寂與哀愴感：回不去的距離，看見了不同的歷史面向。選擇以「哀」為題，以〈八哀詩〉寫下不應該被遺忘的人物與事跡，也更深入思考人事與政治、戰爭的議題，探尋君臣／百姓與權勢／個體間的微妙張力與依存關係。

（二）念茲在茲：太宗與武侯所映現的魚水君臣

君臣關係，自古為難。¹⁸唐太宗親歷建國，從危亂走向太平盛世，宋祁（998-1061）、歐陽脩（1007-1072）《新唐書·太宗本紀》細數三代「至治之君」不過六七，稱譽太宗「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¹⁹司馬光《稽古錄》更以太宗「驅策英雄，罔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締造了「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的盛世。²⁰太宗克己為政，吳兢（670-749）《貞觀政要·論君道第一》首揭太宗執政初期即自覺：

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²¹

以堯舜、周孔為不可暫無的魚水關係。貞觀元年（627）太宗明白指出「海內可安」的關鍵在於「君臣相遇，有同魚水」，與魏徵（580-643）為「君臣相得」的指標。²²貞觀2年（628）太宗論及諸葛亮為相，引陳壽《三國志》的「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有「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的期許。²³

¹⁸ 士人理想的君臣關係，有高世之才而處危疑之際的曹植，〈陳審舉表〉首揭「君臣合德而庶政成」，舉稷、契為「相門有相」的典範，以伊尹與湯武、呂尚與周文為「道合志同」，引《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終究志大難伸。見晉·陳壽：《三國志·陳思王植》（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卷19，頁571-574。

¹⁹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太宗本紀》，卷2，頁48。

²⁰ 宋·司馬光：《稽古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5，頁30。

²¹ 唐·吳兢：《貞觀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臺北：宏業書局，1990年），卷6，頁301。《貞觀政要》乃多錄政諫文本，對歷來君臣互動與國家興衰有許多討論。

²² 唐·吳兢：《貞觀政要·求諫第四》，卷2，頁79；唐·吳兢：《貞觀政要·任賢第三》，卷1，頁54。

²³ 唐·吳兢：《貞觀政要·公平第十六》，卷5，頁260。劉備的「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對太宗的魚水君臣應有啟發。見晉·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卷35，頁934。

太宗尤多自省，²⁴觀覽《尚書》有言：「朕每庶幾唐、虞，亦欲公等齊肩稷、契。」²⁵以堯、舜自許，期許群臣為稷契。貞觀 16 年（642）魏徵上疏力陳「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²⁶作為回應，可見君臣遇合之難。玄宗朝，太宗成為一再被提起的典範，²⁷惜未能為玄宗所遵行。

杜甫的從政之路，即以「致君堯舜上」、「竊比稷與契」²⁸呼應太宗的君臣觀。安史之亂暴發，太宗的典範性日益彰顯。肅宗至德 2 年（757）杜甫因疏救房琯，詔歸鄜州省家，作〈行次昭陵〉，推許太宗「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成為明君，結語「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²⁹對國事軼掌，開國典型蕩然，有無限悵悵。〈北征〉以「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作結，³⁰追憶太宗治世，期望中興。又作〈重經昭陵〉，細數創業垂統，典重高華，結語「再窺松柏路，還有五雲飛」，³¹有興復太宗基業的深衷與期盼。夔州時期，〈往在〉追敘安史之亂以來事，期待「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³²〈八哀詩〉寫賢王李璣，以「虬鬚似太宗」加以形容。次年作〈寄狄明府博濟〉，追憶武周時狄仁傑延

²⁴ 太宗直言「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以致天下喪亂，深知「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明白揭示：「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契合，古來所重」，貞觀 14 年（640）重申「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見唐·吳兢：《貞觀政要·求諫第四》，卷 2，頁 84-85；唐·吳兢：《貞觀政要·君臣鑑戒第六》，卷 3，頁 129、132。

²⁵ 唐·蕭穎士〈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引《貞觀實錄》語。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卷 322，頁 1444-1445。

²⁶ 唐·吳兢：《貞觀政要·君臣鑑戒第六》，卷 3，頁 135-138。

²⁷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宋璟列傳第四十九》，卷 150，頁 4395：稱「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說明宋璟「欲復貞觀之政」，見宋·司馬光：〈唐紀二十七·玄宗開元 5 年（717）〉，《資治通鑑》（臺北：明倫出版社，1975 年），卷 211，頁 6728、6729。開元 17 年（729）吳兢〈上貞觀政要表〉，明指「克遵太宗之故事……必致太宗之業」，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298，頁 1336-1337。

²⁸ 前者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卷 1，頁 74；後者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卷 4，頁 264。

²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5，頁 407-410。

³⁰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5，頁 395-405。

³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5，頁 412-413。

³²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6，頁 1428-1434。

諍，終得「太宗社稷一朝正」，以「時危始識不世才」相互激勵。³³〈可歎〉有「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³⁴終生信守致君堯舜的從政理念，可見太宗在杜甫心目中的指標性。

杜甫君臣書寫的另一個典範，是唐太宗許為賢宰相的諸葛亮。乾元 2 年（759）秦州作〈遣興五首〉，首度提到「孔明有知音」。³⁵上元元年（760）初至成都作〈蜀相〉，慨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³⁶哀千古英雄有才無命者，難掩悵惘哀痛之情。〈諸葛廟〉的「屢入武侯祠」，留連蜀國故跡，惓惓於「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³⁷代宗廣德元年（763）吐蕃陷京師，次年杜甫作〈登樓〉，傷萬方多難，寇盜頻仍，有「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³⁸傷時無諸葛，以致天子蒙塵。永泰元年（765）有〈赤霄行〉，慨嘆世情，以「葛亮〈貴和〉書有篇」自解。³⁹房琯卒，有〈承聞故房相公靈輅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其一「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⁴⁰房琯志在興復，比為名相孔明、謝安。

夔州時期尤重在「君臣」思考，各體兼備。五絕〈八陣圖〉推許諸葛亮功名，結語「遺恨失吞吳」，感慨劉備吞吳失策，以致蜀二世而亡。〈武侯廟〉後半「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即〈前出師表〉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七絕〈夔州歌十絕句〉其九的「武侯祠堂不可忘」，因干戈滿地而益見武侯忠義。五排〈謁先主廟〉寫君臣相得始末，「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先主以伐吳崩於永安宮，武侯一生心事遂成空，思古傷今，感慨淋漓。七古〈古柏行〉的「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追憶成都「先主武侯同閭宮」，武侯得先主大用而為宗臣名世，結語「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哀更多材大難用的志士幽人。七律〈詠懷古跡五

³³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9，頁 1688-1690。

³⁴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21，頁 1830-1833。

³⁵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7，頁 562。

³⁶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9，頁 736。

³⁷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9，頁 1674-1675。

³⁸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3，頁 1130-1131。

³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4，頁 1215。

⁴⁰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4，頁 1234-1235。

首〉其四的「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其五寫武侯平生出處，材大名高，力任艱難，而時勢難為，尾聯「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深為哀歎。〈八哀詩〉寫李光弼的「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寫嚴武的「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⁴¹都可見諸葛亮的身影。

（三）創體與回響：杜甫〈八哀詩〉與宋人的嗣作詮解

劉勰（465-520？）依謚法「短折曰哀」，認為哀辭「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更以「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⁴²因秦國以三良殉穆公的夭枉，使《詩經·秦風·黃鳥》⁴³成為詩人哀辭的指標。嚴羽（？-1245）列舉以歎、愁、哀、怨等為題名者，其中「哀」體以《文選》〈七哀〉、杜甫〈八哀〉為代表。⁴⁴惟若不拘文類，則可溯源屈原〈哀郢〉與庾信〈哀江南賦〉，二者都在國家危亡之際：〈哀郢〉的「哀見君而不再得」、「哀故都之日遠」、「哀州土之平樂兮」，因讒人嫉妒、無罪棄逐而多哀；⁴⁵〈哀江南賦并序〉的「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⁴⁶親歷成敗興亡與百姓流離，交織成難以掩抑的深切哀憤。杜甫論詩有「竊攀

⁴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八陣圖》，卷15，頁1278；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武侯廟》，卷15，頁1277；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夔州歌十絕句》，卷15，頁1306；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謁先主廟》，卷15，頁1353-1355；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古柏行》，卷15，頁1357-1360；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詠懷古跡五首》，卷17，頁1505、1506；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八哀詩》，卷16，頁1381、1387。

⁴²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哀弔第十三〉，《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239。柯慶明〈「哀」「弔」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一文從實用文類的角度，指出「幼弱與英年」是「哀」辭的興感動力，撰文者對未及飛揚卻先殞落的早逝生命，展現「哀憐」情緒與種種不忍不捨。見氏著：〈「哀」「弔」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191-238。

⁴³ 《秦風·黃鳥》三章，同以「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作結，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1，頁243-244。又，文公6年（秦穆公39年，621B.C.），「君子曰」嚴厲批判穆公的「死而棄民」，奪其良臣。見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卷19上，頁313-314。

⁴⁴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詩體》（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頁67。

⁴⁵ 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卷4，頁118-121。

⁴⁶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2，頁94-169。

屈宋宜方駕」，晚年又有「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哀傷同庾信」。⁴⁷選擇以「哀」為題，亦多飽含盛衰之感。⁴⁸

杜甫〈八哀詩〉的創體，乃在以連章詩體製為時賢作傳，論者或以為擬謝靈運（385-433）〈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⁴⁹或取顏延之（384-456）〈五君詠〉。⁵⁰細究〈八哀詩〉的寫作，杜甫作為歷史的參與者，意識到有不能被忘掉的人與事，乃以所見、所聞、所傳聞，建立連章架構，將不為人所知或不為人所重的細節，貫穿於群傳中，對個體生命與時局發展加以聯結和解釋，使個人的生命體驗在歷史層面中得以放大，給後世提供了獨見、獨思的原始史料，無疑具有高度的開創性。〈八哀詩〉對史書的影響，劉昫（888-947）《舊唐書》猶未將蘇源明、鄭虔入傳，宋祁、歐陽脩《新唐書》乃以蘇源明、鄭虔入〈文藝傳〉，應是杜甫〈八哀詩〉的影響。⁵¹宋祁、歐陽脩《新唐書》稱杜甫：

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⁵²

在經歷長時間的戰亂流離後，以詩「傷時橈弱」，所不能忘情的「君」，在宋人嗣作與詮釋中有更大的回響。

王禹偁有〈懷賢詩〉三首，又讀杜甫〈八哀詩〉而作〈五哀詩〉，〈序〉自揭創

⁴⁷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戲為六絕句》其五，卷11，頁900；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詠懷古跡五首》其一，卷17，頁1499；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卷23，頁2094。

⁴⁸ 〈哀王孫〉為王孫淪為階下囚而哀，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4，頁310-312；〈哀江頭〉為帝王出亡寵妃死而哀，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4，頁329-331。

⁴⁹ 〈八哀詩·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璵〉題下注引唐植萱錄：「人謂工部擬魏太子鄴中八篇，可抗衡齊軌。」惟謝靈運詩旨在模寫鄴中文士風流，故舉杜詩自證其非。見唐·杜甫著，宋·魯訔編次，宋·蔡夢弼會箋：《草堂會箋（千家注杜詩）》（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卷24，頁595-596。

⁵⁰ 〈顏延之傳〉記載顏延之每犯權要，辭甚激揚，出為永嘉太守，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見南朝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卷73，頁1893。

⁵¹ 陳尚君〈鄭虔墓誌考釋〉一文指出：「《新唐書》補傳的原因，殆因其名聲及其與杜甫的特殊關係。」見氏著：《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315-334。

⁵²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杜甫傳》，卷201，頁5738。

作緣由乃「有未列於此者，待同志而嗣之云」，⁵³所哀為五賢，以「同志」自許，以「嗣作」展開與杜甫對話，又與〈懷賢詩〉三首合而為八賢。司馬光取〈五哀〉為題，有與杜甫、王禹偁展開跨時空對話的意圖。從杜甫的創體到王禹偁、司馬光的嗣作，強化詩歌創作與個人際遇、時事發展、史書撰述等複雜層次相互對話，結合情志、時事與時政所展現創新力，涉入具歷史縱深並有持續性的論題，對「哀」有更多層面的體會。在詩歌體式上，杜甫〈八哀詩〉與王禹偁〈懷賢〉、〈五哀〉採五古，便於處理豐富的資料與情感，重在文氣一貫；司馬光〈五哀詩〉採五律，貴在精工，就一二事寓慨，有所不能盡。又以連章寄寓作者所閱歷的世變與人事，熔世事國事家事與個人瑣事於一爐，益見情事的多元映現。

宋室南渡（1127-1279）前後，對杜甫〈八哀詩〉的體會有所轉折。葉夢得（1077-1148）《石林詩話》傷其冗雜，「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為盡善」。⁵⁴有感而發者，從創體的角度加以闡釋，胡仔（1110-1170）《苕溪漁隱叢話》引《少陵詩總目》云：

〈八哀詩〉維古風中最為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裡《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誦之。⁵⁵

崔鶯（1058-1126，字德符）經歷北宋垂亡，韓駒（1080-1135，字子蒼）遭遇宋室南渡，感發自多，乃以〈八哀詩〉可與《雅》、《頌》、司馬遷傳贊相提並論。至於〈八哀詩〉之所以哀，蔡夢弼（?-?）於〈八哀詩并序〉題下云：

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魏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甫之八哀，意原于此也。⁵⁶

承劉勰《文心雕龍》釋「哀」體，把杜甫〈八哀詩〉溯源《詩·黃鳥》哀秦穆公濫

⁵³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王禹偁二》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卷60，頁664-665。

⁵⁴ 《石林詩話》指出：「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為盡善。然此語不可為不知者言也。」見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上，頁411。

⁵⁵ 宋·胡仔：〈杜少陵六〉，《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卷11，頁70。

⁵⁶ 唐·杜甫著，宋·魯訔編次，宋·蔡夢弼會箋：《草堂詩箋（千家注杜詩）》，卷24，頁583。

用臣對君的忠義，成為傷肺肝的亙古哀歌。至於蕭統（501-531）《文選》所錄曹植、王粲〈七哀詩〉，則為思婦、棄子之婦而作。⁵⁷葛立方（？-1164）《韻語陽秋》已就「〈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加以辨解，又舉張孟陽〈七哀〉、唐雍陶〈七哀詩〉，「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指出杜甫所哀八人，明顯不同於〈黃鳥〉與曹、王之哀：

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⁵⁸

以八公的武功、文翰、多能與政事有所成就，從戰亂中的歎舊懷賢來詮解杜甫之哀，另以司馬光〈五哀詩〉的忠而被謗為有激而作之哀。這些解釋，凸顯了杜甫〈八哀詩〉的複雜性與別有深哀。

宋元之際，方回（1227-1305）〈秋晚雜書三十首〉其一九：「竊嘗評少陵，使生太宗時。豈獨魏鄭公，論諫垂至茲。天寶得一官，主昏事已危。脫命走行在，窮老拜拾遺。卒坐鯁直去，漂落西南陲。處處苦戰鬥，言言悲亂離。其間至痛者，莫若〈八哀詩〉。我無此筆力，懷抱頗似之。」⁵⁹想像生在太宗朝的杜甫，當可與魏徵抗衡，可惜遭逢主昏事危，因鯁直而流落邊陲，苦戰鬥，悲亂離，對〈八哀詩〉深具同情之感。同處易代，懷抱頗似而同感無此筆力者，有親歷最慘烈戰爭的文天祥（1236-1283），於元大都獄中完成《集杜詩》，小序結尾多用「哀哉」，集詩多用〈八哀詩〉句。⁶⁰杜甫〈八哀詩〉的創意，引發作者與讀者的同情共感，甚至容許「言外之旨」以擴大詮釋空間，都值得回歸文本，抉隱入微地精讀詩作。

⁵⁷ 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年），卷23，頁316。「詠史」另錄有王粲〈詠史〉、曹植〈三良詩〉，才是哀三良之作。

⁵⁸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冊，卷4，頁519。

⁵⁹ 元·方回：《桐江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9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2，頁9。

⁶⁰ 元·文天祥：《文文山全集·集杜詩》（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16，頁397-441。

三、為時賢作傳：杜甫〈八哀詩〉的道大難容

天寶九載（750），杜甫〈進雕賦表〉自陳世代「奉儒守官」，引鷲鳥的犀利搏擊為喻，闡明「正色立朝」的大臣本色，⁶¹乃在嚴正無畏，確保君臣的分位。安史亂起，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哥舒翰兵敗潼關，玄宗幸蜀，以房琯為相，建議分置，而七月肅宗即位，八月房琯奉寶冊至靈武，十月以房琯為招討使，惟房琯畢竟非將才，⁶²兵敗陳陶斜，再敗青阪。杜甫陷長安，至德元載（756）冬作〈悲陳陶〉、〈悲青阪〉，⁶³皆就兵敗而發，局勢倉卒，傷亡慘烈，憂國念亂，心急如焚。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奔赴行在，五月授左拾遺，而房琯以兵敗又為人所譖罷相。杜甫疏救房琯，以「罪細，不宜免大臣」，詔三司推問，⁶⁴力救者以恐「絕言者路」、「不失諫臣體」，終得免。⁶⁵杜甫〈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以房琯「有大臣體」、「深念主憂，義形於色」，⁶⁶可見疏救房琯關涉到正色立朝的「諫臣體」與「大臣體」。大曆元年作〈壯游〉，猶以疏救房琯為「君辱敢愛死」，終身不悔。

杜甫以疏救房琯入獄，又與房琯、嚴武俱貶。更多有關用人的思辨，乃在「將相得人」。至德二載（757）〈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的「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喜得廣平王俶、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諸將。⁶⁷乾元2年（759）作〈洗兵行〉，有廣平王功成不居，郭子儀更兼良相，又有李光弼、

⁶¹ 〈進雕賦表〉取「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之義，「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4，頁2172-2173。

⁶² 房琯自請將兵平賊，玄宗在蜀直指「此非破賊才也」。見宋·宋祁、歐陽修等合撰：《新唐書·李林甫傳》，卷223上，頁6349。

⁶³ 〈悲陳陶〉開端即以「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更直言「四萬義軍同日死」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4，頁314-315；〈悲青阪〉結語「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4，頁316-317。

⁶⁴ 唐·杜佑：《通典·職官六》（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24，頁672：「其事有大者，則詔下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同按之，亦謂此為『三司推事』。」。

⁶⁵ 三司力救諸人，宰相張鎰以「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御史大夫韋陟以「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參見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92，頁1961；宋·宋祁、歐陽修等合撰：《新唐書》，卷122，頁4352。惟杜詩中只寫到張鎰、崔光遠，不及韋陟。

⁶⁶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杜詩詳注》，卷25，頁2197-2198。

⁶⁷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5，頁417-421。

王思禮等豪俊，是平亂的關鍵；更因扈從濫恩，舉蕭何、張良的「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仇兆鰲指為「望宰相得人以致太平」，引朱鶴齡評曰：「中興大業，全在將相得人」，⁶⁸都指出「命將得人」、「將相得人」為〈洗兵行〉要旨。入蜀後對諸葛亮兼具將相才，〈古柏行〉的「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仇注以為「即孔子道大莫容意」，⁶⁹語出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感慨「吾道非邪」，顏回答以「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進一步闡釋：

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⁷⁰

以修道為己任，把有道之士不為世所用，歸於「有國者之醜」，也因「不容」而更凸顯出「君子」的本色。這一年，杜甫一再回顧當年親歷的歷史「現場」，思索「古來材大難為用」的深沉論題，慨往懷古，議論世事，以詩當紀傳，為廟算運籌，於複雜事勢中揭示難言之情事。特別是以「哀」為題的〈八哀詩〉，為時賢作傳，也為有道有才而「不用」、「不容」的「君子」寫真。

（一）八公群像：〈八哀詩〉所揭示的事功與情志

杜甫強仕之年，正處於安史之亂暴發前後的轉折點。亂後十年，杜甫〈八哀詩〉揀擇八位安史之亂的核心人物，〈序〉云：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次焉。⁷¹

長達十年（755-766）的兵連禍結，生民塗炭，衍生的喪亂流離，破壞性極大且影響深遠。表列依序標示八公生卒年、卒年距安史亂起（755）時間、卒時杜甫年齡：

⁶⁸ 〈洗兵行〉開端「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兩京已收，「獨任朔方無限功」、「郭相謀深古來少」、「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肯定將相得人。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6，頁514-521。

⁶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古柏行〉，《杜詩詳注》，卷15，頁1357-1362。

⁷⁰ 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47，頁1931-1932。

⁷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6，頁1372-1420。

人名	王思禮	李光弼	嚴武	李璡	李邕	蘇源明	鄭虔	張九齡
生卒年	?-761	708-764	726-765	?-750	674-746	?-764	691-759	678-740
安史亂	6	9	10	-5	-9	9	4	-15
杜甫年	49	52	53	38	34	52	47	28

八公最早卒於亂起前十五年，最晚卒於亂起後十年，先後卒於杜甫二十八至五十三歲。杜甫作為見證者與同行者，親身觀察才志之士的生命軌跡與政局興衰，以詩作傳，都以官職稱：原職銜者有〈故司徒李公光弼〉、〈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四人；死後贈官者有〈贈司空王公思禮〉、〈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四人。

帶著清晰的反省意識，八公不依存歿先後詮次，著力於生平事功與個人情志之間的生發，彼此間呈現個性、命運與政局的交錯。就身分而言，王室有李璡，宰相有張九齡，武將有王思禮（高句麗人）、李光弼（契丹族人）、嚴武，文官有李邕、蘇源明、鄭虔。除張九齡、李邕、李璡先後亡於安史亂前，其餘五人都經歷過安史之亂。與房琯有關者，有王思禮、嚴武。杜詩留下最多交往行跡者為嚴武，其次是鄭虔、蘇源明、李邕、李璡，較少涉及王思禮、李光弼，於張九齡多得自其詩與事。在平亂名將中獨取王思禮、李光弼以為始，而止於開元名相張九齡，以見傷時、嘆舊與懷賢。這樣的起結，從平亂猶未了，回溯亂起前的賢相，八公各有面目，交往互動既有不同，資料詳略又不一，最短為李光弼的四十句，最長為李邕的八十六句，或可與杜詩參證，或另有聞見，於剪裁去取之間，照見個人生死浮沉與興亡理亂。逐一闡述如下：

其一，〈贈司空王公思禮〉。⁷²安史亂起，先有守潼關的封常清、高仙芝以「失律喪師」遭斬，及哥舒翰兵敗，玄宗入蜀，肅宗即位，〈洗兵行〉的「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⁷³分指李光弼與王思禮，喜命將得人。上元元年（760）杜甫初入蜀，〈散愁二首〉於諸將中，獨屬望王思禮、李光弼，寄以討賊平亂之厚望。⁷⁴

⁷²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6，頁1373-1379。

⁷³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6，頁516。

⁷⁴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散愁二首》其二，卷9，頁773-774：首四句「聞道并州」

故八詩始於王、李二良將。全詩六十四句，「司空出東夷」四句，寫王思禮為高麗人，童稚穎銳。「服事哥舒翰」十六句，敘其從東北的燕薊軍旅，到河西的流沙磧石，摹寫王思禮的形象與御敵戰功，凸顯王思禮所長，在於個人膽色與勇猛善戰，征伐青海、天山等西陲邊地，更以神駒、鷲鳥為喻，以見穎銳之姿。「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四句，肯定王思禮兼具兵家謀略與《春秋》大義，自有其胸襟氣度。「潼關初潰散」十六句，細筆寫潼關潰敗的情勢，哥舒翰被俘而卒，副使王思禮倉皇抵行在，遭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幸得房琯諫而得救。「翠華卷飛雪」十六句，敘平亂功績，軍令肅清，百姓無擾，巷有謳歌，青麥在野。至德 2 年（757）從廣平王收西京，王思禮領兵先入景清宮。乾元 2 年（759）出鎮太原，「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歿於太原，以「不得見清時」為憾。「永繫五湖舟」四句，感慨王思禮心事，徒有千秋之業可與雲水共長存。結語「昔觀文苑傳」四句，感慨後續用非其人，致有鄧景山引軍眾憤怒而被殺。王思禮一生，見證由極盛到驟變到衰微再到復興的歷程，可惜年壽不永，大亂未平，於「將相得人」尤有深慨。

其二，〈故司徒李公光弼〉。⁷⁵杜詩言及李光弼者，除前引〈洗兵行〉與〈散愁二首〉外，乾元元年（758）九節度使圍鄴城，〈觀兵〉的「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即李光弼有直搗幽燕、不當師老鄴城之議。乾元 2 年（759）李光弼於河陽大破賊眾，次年乘勝平懷州，上元元年（760）作〈恨別〉，有「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⁷⁶全詩四十句，「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八句，直接從李光弼事功談起，與郭子儀大敗叛軍，收復河北十餘郡。尤以太原之戰，以寡擊眾，大獲全勝，使朔方無虞，百姓安居，肅宗即位靈武，李光弼功不可沒。「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顏壓」八句，再寫赫赫戰功，乾元 2 年（758）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大破史思明，擒安太清，獻俘太廟。「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八句，寫封王之功甚大，而讒毀隨之，

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

⁷⁵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6，頁 1379-1383。

⁷⁶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觀兵》，卷 6，頁 507-508；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恨別》，卷 9，頁 772。

上元 2 年（761）被迫倉皇出戰，兵敗邛山，出鎮臨淮。「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二句，直指中官之讒，李光弼以憂讒畏禍，不敢入朝，竟致憤激發病而亡，可謂死有餘恨。「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八句，寫人心追悼，極寫謀略、雅望與英姿，哲人其萎，以棟樑、長城毀比喻朝廷痛失人才，三軍痛失良將。結尾「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八句，以李光弼屢奏大捷，匡扶帝業，功存社稷，而中官讒毀，死淚承睫，使烈士痛心，有待直筆史臣為之昭雪。

其三，〈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⁷⁷安史亂起，嚴武隨玄宗入蜀。赴肅宗行在，房琯任相，以嚴武為「名臣子」，薦為給事中。至德二載（757）杜甫任左拾遺，有〈奉贈嚴八閣老〉。房琯罷相，嚴武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代宗寶應元年（762）奉調入京，廣德 2 年（764）再鎮蜀。杜甫入蜀，曾入嚴武幕，與嚴武互動頻繁。洪邁《容齋續筆》就杜甫集中「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無論送武還朝者，或喜其再鎮蜀，乃至〈哭歸櫬〉等詩，稱其「眷眷如此」。⁷⁸嚴武鎮蜀，大破吐蕃，無敢犯境者，武去而蜀亂起，再無寧日。全詩六十八句，「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二句總起，許嚴武為堪當大任的不世之才。「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十句，寫其早成早達，文學出眾，嫉邪力爭，不負言責。「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二句，以將相自許，為下文伏脈。「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六句，敘其從玄宗入蜀。「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十四句，敘其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徵」，兼有將相才，戮力恢復，浴血奮戰，終得收復兩京。「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八句，先拜京兆少尹，旋坐房管事貶巴州刺史，以簡筆寫寵辱無常，凡四登會府，兩居京尹，三掌節度使，頻繁出入蜀道，終未能畢其功而身歿。「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十八句，以詳筆寫在蜀功績，借諸葛、文翁寫恩德在人；以「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見其身繫蜀地安危。兼寫虛懷待士，以「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見其謹小慎微，觀釣問俗，留心民瘼。杜甫有〈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從田父口中寫出政簡俗龐、家給戶饒景象，⁷⁹可見一斑。「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

⁷⁷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6，頁 1383-1390。

⁷⁸ 宋·洪邁：《容齋續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卷 6，頁 283。

⁷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1，頁 890-893。

願，庶或裨世程」四句，重敘經畫之大者。「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四句，感慨籌邊壯志未酬，身先死。「飛旄出江漢，孤舟輕荊衡」六句，悵望喪返途遠，不能自己。嚴武大破吐蕃，收鹽川，為當時第一功。杜甫比為諸葛亮、文翁、顏回、賈誼，可見加意與深情。

其四，〈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⁸⁰繼三良將之後，接寫賢王李璡，乃帝王家事。天寶五載（746）作〈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稱李璡有尊君謙己之德，「晚節嬉游簡，平居孝義稱」、「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⁸¹可見性情與接遇之厚。〈壯游〉追憶「賞游實賢王」，對「曳裾置醴地」的真誠待士，長繫於懷。惟兩《唐書》記載李璡都只寥寥數十字，寫其「性謹絜，善射」，與賀知章等為詩酒之交。⁸²此詩歷來多以為無可哀。⁸³全詩五十二句，開端「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四句，揭示李璡為讓皇帝李憲長子，又從帝王相貌提出太宗，以見其嫡長子孫的身分。「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六句，寫玄宗恩遇，尤以「愛其謹潔極」一句，既成全了玄宗，更以自保。「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十六句，寫玄宗詔獵、李璡陪獵事，極意鋪揚射雁事，以見恩倖。「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八句，見李璡忠勤，有使民得休、使物不傷之仁。「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四句，用楚元王敬禮穆生而置醴故事，敘其禮賢下士，「道大容無能」一句尤為關鍵，顏回有孔子道大莫容之說，此以李璡「道大」，所謂「無能」，有顏回「不違如愚」意，也可以指「無能為」者，⁸⁴總在說明李璡對人才有極大包容度。「好學尚貞烈，義形必沾巾」四句，敘其好學、尚義、工書法、長詩作與交游之盛，迥異於〈飲中八仙歌〉所形容「汝陽三斗始朝天，道

⁸⁰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6，頁1390-1394。

⁸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頁60-65。

⁸² 五代·劉昫：《舊唐書·睿宗諸子》，卷95，頁3014；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三宗諸子》，卷81，頁3599。

⁸³ 指李璡被寵且善終，「本無可哀」，純是「追舊而賦」。見明·王嗣爽撰：《杜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7，頁237。

⁸⁴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注疏·隱公4年》，頁57：「衛國偏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又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注疏·僖公30年》，頁285：鄭國危，鄭伯欲使燭之武見秦君，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的酒徒形象。⁸⁵「川廣不可溯，墓久狐兔鄰」四句，寫塋墓久荒，祭掃無人，王弟漢中王瑀又貶蓬州長史，⁸⁶可見身後淒涼。「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六句，同懷俱在天涯，撫今憶昔，對李璿道大能容眾，可惜不在其位，不能為，只以「謹潔極」自持，以遇酒「口流涎」自毀，以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走完一生，也使得時賢、時世陷入更多艱難。

其五，〈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⁸⁷李邕父為李善，武則天璽（624-705，690 即位）時，李嶠、張廷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召為左拾遺，剛直敢諫，出為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戶。玄宗召為左臺殿中侍御史，負美名，多招忌，史稱「性豪侈，不拘細行」、「執事忌勝，剝落在外」，頻被貶斥。杜甫少年日已有「李邕求識面」，天寶四載（745）游齊魯，〈陪李北海宴歷下亭〉結四句「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⁸⁸各役於事，難期後會。天寶六載（747）初，高齡七十的李邕以細故牽連而遭杖殺。《新唐書》稱：「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⁸⁹全詩長達八十六句，開端「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四句，為盛名招禍作張本。「憶昔李公存」八句，寫高才，學有根柢，見精識大，書法、文章兼擅。「干謁走其門」十四句，寫聲名盛，干謁求索者眾，尤以墓道、寺觀、學宮或遺愛等碑文體制，深獲矚目與臨摹，不獨「映當時」，也必然影響後世。「豐屋珊瑚鉤」八句，寫重饋求文者眾，而性好調給，是多取而能分惠者。「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四句，為長篇關鍵，痛其高才不遇，以獨步四十年的聲望，而仕路起倒，以致冤斃，有孔子道窮之悲。「往者武后朝」二十句，倒敘李邕立朝，聲援宋璟劾張昌宗兄弟，風節凜然；「忠貞負冤恨」一

⁸⁵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頁82。

⁸⁶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漢中王瑀》，卷81，頁3600：「肅宗詔收羣臣馬助戰，瑀與魏少游等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⁸⁷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6，頁1394-1403。

⁸⁸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卷1，頁74；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卷1，頁36-37。

⁸⁹ 五代·劉昫：《舊唐書·文苑中李邕》，卷190中，頁5039-5043；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文藝中李邕》，卷202，頁5754-5757。

句，揭露玄宗為小人所蔽塞，累貶雷州司戶、崖州舍城丞、欽州遵化尉，即所謂「困炎厲」；詳敘李邕高才聲名，而負謗被逐如小臣，痛其直節受枉，有「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瘳」之歎。「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八句，追溯東都初遇，臨淄再遇，可見交契。詳寫論文，對崔融、蘇味道、楊炯、李嶠，各有品評。「是非張相國」四句，對張說有是非之隙，埋下相扼而陷於險境。「例及吾家詩」六句特別就杜審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的詞句、聲律與氣勢，贊譽有加。「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八句，寫李邕之死，才高一世，竟遭無妄之禍，血漬青州，骨槁汶陽，代宗贈秘書監，尚待揭厲。身後蕭條，舊交滯遠，朝無直臣，而「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戰事方殷，無人為謀昭雪，撫時增嘆。結「朗吟六公篇，憂來豁矇蔽」二句，原注：「公有張、桓等五王泊狄相〈六公〉詩。」李邕〈六公詠〉詠中宗復位事，⁹⁰於戰亂未平時朗吟之，自有無任悲愴。

其六，〈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⁹¹開元 24 年（736）杜甫至哀州省親，蘇源明客徐哀，〈壯游〉記兩人同游，有「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疆」。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亂前，〈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有「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可見交情。安史亂起，鄭、蘇同陷長安，收京後蘇擢考功郎，鄭遭嚴譴貶台州。廣德 2 年（764）蘇、鄭先後卒，杜甫作〈懷舊〉首揭「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悼蘇亡如伯牙之失知音，結語「不復更論文」，可見知交。又作〈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開端「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寫二公「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⁹²憶往傷亡，有無限感慨，極見生死交情。全詩六十句，「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十二句，敘其少孤力學，忍飢垢衣，貧能苦志。「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十二句，敘其學醇文博，文章日顯，官職屢遷，為太子諭德。「一麾出守還，

⁹⁰ 李邕〈六公詠〉，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暉王博陵、柬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五王為一章，狄丞相別為一章，已佚。五王皆狄仁杰所進，所以能成大功。見宋·趙明誠：《金石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8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26，頁 339。

⁹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6，頁 1403-1409。

⁹²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壯游》，卷 16，頁 1441；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懷舊》，卷 14，頁 1189-1190；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卷 14，頁 1190-1192。

黃屋朔風捲」十四句，寫安史亂起，玄宗幸蜀，蘇源明在淪陷區，以病不受偽署，仍得與郊祀盛典。「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臠」六句，敘其文章豐美，有揚雄大才，直節有為；「反為後輩褻，予實苦懷緬」二句，感慨其為後輩所褻視。「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攀」六句，寫蘇源明力諍齋房瀆祀事，⁹³以見忠愛之誠。「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八句，從二十八年的交誼，帶出鄭與蘇的同遭安史之亂，蘇源明雖留京而難逃凶年餓死，鄭虔遠謫而客死他鄉。結「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四句，自敘痛失二侶，獨在夔州，戰伐未解，歸帆無期，不得執紼，遺憾難解。

其七，〈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⁹⁴承上接寫盛世酒徒的鄭虔，安史亂起以六十六高齡陷賊而遭嚴譴，⁹⁵自有無限痛楚。鄭虔貶後，時時憶念，⁹⁶孤危之狀，死生之痛，溢於言表。全詩六十四句，開端「鸚鵡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四句，以海鳥誤入魯、張華〈鷦鷯賦序〉、禰衡〈鸚鵡賦〉三事，總寫脫略名利而以陷賊被污名，可謂深悲極痛。「滎陽冠眾儒，早聞名公賞」四句，記其名位與著述，「早聞」句下原注：「往者，公在疾，蘇公頌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撫問，臨以忘年之契，遠邇嘉之。」既是才名早著，又居士林崇敬的著作郎。「天然生知姿，學立遊夏上」八句，寫其生知多學，博聞多識，兼擅醫書、兵略。「薈蕞何技癢」句下原注：「公著《薈蕞》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兵學有《天寶軍防錄》。「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六句，敘其學術淵博，善地理，識天文，可比揚雄、東方朔；且又才藝絕人，工書法，能繪畫，兼有顧野王、鍾繇、

⁹³ 五代·劉昫：《舊唐書·肅宗本紀》，卷10，頁252：「初置太一神壇於圓丘東……命宰相王玙攝行祠事。」

⁹⁴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6，頁1409-1414。

⁹⁵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直言「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5，頁424-426。

⁹⁶ 〈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的「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翁懷直道，也沾新國用輕刑」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6，頁470-471；〈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有「昔如水上鷗，今為置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歎其「多為才名誤」、「更被時俗惡」，結語「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7，頁559-561；〈所思〉（原注：得台州司戶虔消息）的「世已疏儒素，人猶乞酒錢」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8，頁666。

鍾會之能事。「文傳天下口」六句，極見聲名之大，玄宗知賞，許為詩書畫三絕，名重當時。如此才華、著作、聲名與玄宗賞譽，遭遇卻是極為冷落。「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十四句，敘其嗜酒、彈琴本為文士來往雅事，而「益疏放」與「視天壤」則是無相親，以至形如草木，几杖相伴；及長安淪陷，心歸王室，仍以陷賊故而有台州之貶，履穿拾橡，生活貧困。「空聞紫芝歌」六句，想像埋跡深山，深為痛惜。「春深秦山秀」六句，追憶長安事，⁹⁷或宴游劇談，或醉後吟詠，流連時物每有生發。「詞場竟疏闊」四句，往昔的獎掖，如今已成疏闊，對鄭虔之亡，用《檀弓》的「梁木其毀，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有無限哀思。結語「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四句，「蕭條」句下原注：「著作與今秘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以阮咸說明鄭虔有侄審，謫在江陵，哀死念生，同有飄泊之哀悽。

其八，〈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⁹⁸張九齡為良相，可惜玄宗不能堅其信用，被謫外放，是國勢由盛轉衰的先知先覺者。安史亂後，杜甫久客傷亂離，探索致亂之由，設想君王受諫，息兵愛民，俊乂在朝，⁹⁹何至禍綿不息？依稀可見張九齡身影。全詩四十八句，「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六句，首揭張九齡為韶州曲江人，有金璞之質，可成大器；尤以品格不凡，仙鶴霜毛，矯然不群，見其不慕權貴。「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四句，寫其不務巢棲，獨懷致君堯舜的茅茨土階，事君才幹獲得玄宗重用。「碣石歲崢嶸，天池日蛙黷」六句，寫范陽有安祿山日益壯大，君側有李林甫等讒佞小人，張九齡志在大庭返樸，對同僚乃能不計私忿，獨以「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二句，意指安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可謂洞燭先機，慮患於未萌，可惜玄宗不聽，導致安史之亂暴發，實為八

⁹⁷ 杜甫有〈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重過何氏五首〉、〈鄭駙馬池台喜遇鄭廣文同飲〉等詩。

⁹⁸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6，頁1414-1420。

⁹⁹ 〈遣憂〉的「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2，頁1054-1055；〈中夜〉的「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7，頁1460-1461；〈提封〉的「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征俊乂入，莫慮犬羊侵」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7，頁1527-1529。

哀關鍵。「雖蒙換蟬冠」四句，寫張九齡身居尚書右丞相要職，仍深自謙抑，常以疏廣、疏受歸養自期，惟看似優遇，而不提相業，可見憂畏之懷，一片心事。「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四句，卒以舉非其人罷相，坐貶荊州長史，¹⁰⁰仍能悠然自得，卓有政績。「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十六句，寫其抱濟世之才，退而用心於文章，饒有詩才文學與風流韻事；其詩力厚詞爽，可聽可味；其文波瀾激蕩，才氣高蹇，兼有玄暉、任昉之勝，才名久著南方。「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八句，寫退歸猶心繫朝廷，一生事業，有監修國史，上《六典》，而死於蕪絕嶺外。撫今傷昔，結引張九齡為南州高士徐穉所作〈徐徵君碣〉，想見其人，有理艇拜墓之思。

（二）連章見意：「道大容無能」的公道與深心

〈八哀詩〉的寫作，先有諸多相遇、相交與相惜所構成的「前傳」，最終透過同一主題和合傳概念，以詩歌語言呈現難以言傳的複雜性，將大量訊息濃縮而成為八公群像。盧世淮《讀杜私言》指出〈八哀詩〉的獨特性：

〈八哀詩〉未免傷煩又傷汎，中有數十光潔語、與日月竝垂者，又為濃雲所掩，然而詩家之元氣在焉，杜詩之體統存焉。不可遺，亦不容選。¹⁰¹

雖有傷煩、傷汎、濃雲掩光潔之歎，仍認定〈八哀詩〉具詩家元氣，能存杜詩體統，且有不可刪削、分割的連章特性。筆者曾為「連章詩」定義如下：

於同一時間與同一心境之下，以同體之詩數首或數十首，從各種不同之角度，描寫同一之主題，而各首之間，有其密切之關係，次序一定，不可倒置，且彼此相互補充，相互闡說，分之雖可各自獨立，而合之則凝成一整體，蓋各首之間，有其必然之關聯也。¹⁰²

特別強調各首次序一定，既可獨立成篇，合則必為一整體。〈八哀詩〉分而各自成篇，合則成為相互補充、相互闡說之整體，挑戰性極高，亦可見杜甫深心所在。

¹⁰⁰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張九齡》，卷126，頁4429：「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

¹⁰¹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頁9106。

¹⁰² 廖美玉：《杜甫連章詩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頁1。

八詩採倒敘法。因戰亂未息，從平亂名將談起，其一至三皆良將，中間以「道大容無能」的賢王李璣為樞紐，其五至七皆以文章名，結以開元名相張九齡。始於王思禮、李光弼，杜詩每以王、李連言，喜命將得人，屢破叛軍，並以討賊平亂屬望二公。可惜王思禮年壽不永，功名未就。李光弼有中興第一名將之稱，異姓封王，竟難敵中官讒言，憂懼而卒。盧元昌《杜詩闡》即以「假令思禮未歿，幽薊蕩平，河北諸蕃，誰敢負固」、「假使讒口不行，主眷如故，光弼無恙，為萬里長城，不惟抗幽燕，即懷恩亦何至反側」，¹⁰³自屬公道。其三嚴武，與房琯同時被貶，三入蜀地，大破吐蕃，鎮蜀無敢犯境者，去而蜀無寧日，可惜年壽不永。以上為肅宗朝故事，王思禮與嚴武都與房琯有關，設使君王專任三將，何至兵連禍結十年未息。

其四李璣，梁運昌《杜園說杜》極陳李璣之可哀，從肅宗疎忌兄弟說起，「讓皇二子，其一已卒，其一遠貶」，引杜詩「墓久狐兔鄰」五字，是「于不可說中說話」。¹⁰⁴從連章體製說，本詩承上啟下，李璣與李邕、張九齡都屬玄宗朝，蘇源明、鄭虔經歷玄、肅兩朝。李璣是讓王之子，以自抑、自毀形象成就玄宗一人。尤以「道大容無能」一句為全詩樞紐，如果讓王不讓，李璣在位，禮賢下士，八公遭遇與時局必然會有所不同。

其五至七上溯玄宗朝及亂起故事，三公皆以書名，也都是才高運舛的名士。其五〈李邕〉，生當盛世，才高一世，以剛直招忌，以七十高齡遭讒，詔杖殺，繁言「忠貞負冤恨」、「禍階初負謗」、「魂斷蒼梧帝」、「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不避重複，可見悲愴難已。其六蘇源明，文章豐美，直節有為，¹⁰⁵而「反為後輩褻」，屈居下僚，餓死京城。其七鄭虔，才名早著，學術淵博，遭遇極為冷落，以陷賊庭被污名，客死異鄉。蘇源明與鄭虔同為陷賊不從，寫蘇源明而以鄭虔陪筆收結，寫鄭虔也以蘇

¹⁰³ 清·盧元昌：《杜詩闡》（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卷21，頁1-15。

¹⁰⁴ 清·梁運昌：《杜園說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259-262。

¹⁰⁵ 五代·劉昫《舊唐書》無蘇源明傳。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文藝中蘇源明》，卷202，頁5771-5773：多紀其諫言，尤以諫肅宗親征事，力陳不可者十，略如：「自春大旱，秋苗耗半」、「餓夫執殳，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殍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直言「大河南北，舉為寇盜，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分析「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諸將不日可至等。

源明陪筆收結。而嚴武詩與鄭虔著作，尤賴杜詩以傳。

其八張九齡，開元良相，時局先知先覺者，以一身繫興亡理亂之樞機，是八詩中最難詮讀者。寫張九齡的人品、才能、志向，特別強調「寂寞想土階」、「退食吟大庭」的上古淳樸，無邪無謗，恰是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大庭終反樸」、「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的一生念想。¹⁰⁶全詩關鍵有三：一是「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二句，論者以為張九齡一生大節所在。¹⁰⁷另有〈提封〉議論致亂之由：「時徵俊乂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仇注以為「不聽張九齡，而致祿山終叛。使當時息兵愛民，焉有天寶之禍哉」，¹⁰⁸安史之亂是一個可預見、預防的內亂事件，可惜玄宗無所作為，是身為帝王無可推托的政治責任。二是畏讒被廢，李林甫既嫉之若仇，張九齡「度其巧譎，慮終不免」，作〈海燕〉詩以表達「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的退避意，¹⁰⁹而終究細故牽連，坐貶荊州長史，遂至亂端生成。擺在連章體製尤見深意：李光弼畏讒懼詔，嚴武三入蜀地，李邕被杖殺，蘇源明餓死京城，鄭虔貶死客鄉，顯示玄、肅在容人雅量與對人的信任度都不足，凸顯讓王之子李璣的「道大容無能」，懷賢與傷時相互闡發，尤見深心。三是不言相業，深論貶謫後的用心文章，尤以「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二句，想見張九齡詩之妙。梁運昌《杜園說杜》評以「獨及文章者，是時陳拾遺雖有盛名，而掃王楊之舊習，開李杜之先聲者，實曲江為之職志，其文章亦見升降關頭。」¹¹⁰在政事之外，確立了張九齡的詩學史地位。

¹⁰⁶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卷1，頁74；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夔府書懷四十韻》，卷16，頁1426；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同元使君春陵行》，卷19，頁1692。

¹⁰⁷ 仇兆鰲云：「曲江見祿山有反相，欲因失律誅之，明皇不聽，至幸蜀以後，追思其言，遣使祭贈。此事乃一生大節，關於國家治亂興亡。」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6，頁1419。

¹⁰⁸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7，頁1528。

¹⁰⁹ 唐·孟棻：《本事詩·怨憤第四》，收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上冊，頁17：「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為〈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¹¹⁰ 清·梁運昌：《杜園說杜》，卷5，頁273-277。

（三）推求用心：〈八哀詩〉所關涉的重大議題

杜甫以連章鉅作〈八哀詩〉為「大臣」寫真，以時賢的個體生命為軸線，寫人和記事緊密結合，把複雜的個人性格、人品、才學、遭遇，藉由今昔盛衰、時事變遷的多重交織與參照，既是為個人作傳，也留下極其珍貴的時代紀錄。盛衰死生一瞬的詭譎時局變化，是無法忽視也掙脫不了的時事網絡，卻也沒有因此掩蓋掉人物的獨特性，特別是才高氣盛而不見容於當世，遭讒而受君王的貶斥乃至敕死者，除了個人的憾恨，關聯的政局動亂與百姓流離，有哀矜、哀憫、悲愴與哀痛，成了終難釋懷的亙古之哀。關涉的重大議題，除了君臣、治亂與存歿之感，更涉及事功之外的文學與著作。綜觀八公際遇，或年壽不永，或遭讒受誣，或憂懼愧悔，或狂放不羈，或隱忍求全，既為盜賊未息哀，更為八公尋求應有的公道與定位。推求杜甫用心有三：

其一，扶顛籌策，謀求長治久安。班固《漢書·賈誼傳》記載賈誼於盛世預見勢事可痛哭者，陳匡建之策，以「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¹¹¹可見仁人志士之用心在長治久安。杜甫詩中常用賈誼故事與詞語，與八公有關者，如〈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寫鄭虔有「賈生對鵬傷王傅」，〈八哀詩〉感慨嚴武籌邊壯志未酬而身先死，有「賈誼徒忠貞」。寫李邕在武后朝有「面折二張勢」的凜然正氣，因仇人告狀而有「禍階初負謗」，終致「忠貞負冤恨」。杜甫於盜賊未息之際，以詩當紀傳，議論世事，一腔血愴，直探「材大難用」的深沉論題，為廟算運籌，直指中興大業在「將相得人」。回顧大唐由盛到衰的變局，玄宗不是庸君，安史亂前，名相倍出，強將如雲；即令亂起，玄宗諸子不乏能者，又多賢人良將。戰亂因何而起？又何以兵連禍結長逾十年，百姓流離，生民塗炭。〈有感五首〉之五的「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¹¹²明確揭示君王有無可迴避的政治責任。〈八哀詩〉繫心時局，亟見為天下籌謀長治久安之深心。

¹¹¹ 漢·班固：《漢書·賈誼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卷48，頁2230-2231：「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¹¹²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1，頁976。

其二，事功之外的藝文成就。杜甫〈進雕賦表〉，以杜預的「奉儒守官」與杜審言的「文章」並列為家族榮耀的典範，¹¹³宋祁《新唐書》稱杜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¹¹⁴〈八哀詩〉哀時賢的材大難用，乃以更多的私人生活細節與志業，抗衡「操之在君」的「事功」，摹寫才學之士在朝政外的身影與定位。八詩除平亂名將的王、李，寫嚴武的武功之外，有「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稱嚴武「詩清立意新」，留存與嚴武往來詩作。寫李璡的「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敘其好學、尚義、工書法、長詩作與交游之盛。寫李邕高才，學有根柢，見精識大，書法、文章兼擅，尤以墓道、寺觀、學宮或遺愛等碑文體制，有獨步四十年的聲望。《宣和書譜》稱李邕「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¹¹⁵即以文章獨立於事功之外。寫蘇源明「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敘其學醇文博，文章豐美。寫鄭虔生知多學，博聞多識，「學立游夏上」，兼擅醫書、兵略、地理、天文，且又才藝絕人，工書法，能繪畫，名重當時。寫張九齡「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罷相後用心於文章，饒有詩才文學與風流韻事，以「哀」為題，益見痛惜抱濟世之才者的深哀。玄宗朝，張說（667-730）、張九齡先後為「文學」名相。隨著張九齡罷相，時局也為之變遷，〈八哀詩〉以此作結，勾勒出的時代圖景，恰是巨變的開端，最是耐人尋味。

其三在好善懷賢。盧世淮《讀杜私言》獨推杜甫的「好善懷賢，誠求樂取，一片古今熱腸，萬里乾坤大眼」，所云「自冠帶以至韋布，靡不披豁，相對一往而深」，特就與人交往而言，「總之以忠厚惻怛為主」，¹¹⁶可見至性。檢視兩《唐書》所載八公，當時讒言，已有是非之論：王思禮戰數有功，史書指其「短於用兵」、「短攻戰」，在太原「儲粟至百萬斛」，¹¹⁷而文吏掎摭，謂有虛耗軍糧者。李光弼戰功彪炳，程元

¹¹³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4，頁2172-2173。

¹¹⁴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杜審言傳》，卷201，頁5737。

¹¹⁵ 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1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卷8，頁251：稱「邕剛毅忠烈，臨難不苟免，少習文章，嫉惡如仇，不容於眾，邪佞為之側目。然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

¹¹⁶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頁9102-9104。

¹¹⁷ 五代·劉昫：《舊唐書·王思禮傳》，卷110，頁3312-3313；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王思禮傳》，卷147，頁4749-4750。

振、魚朝恩用事，深忌切骨，李光弼畏禍遷延不敢入朝，愧恥成疾，憂懼而卒。¹¹⁸嚴武兩鎮蜀，武卒而蜀中訖無寧宇，史書乃記其所為多不循理，「性本狂蕩」、「驕倨」、「肆志逞欲」、「峻掊亟斂」等，《雲溪友議》更有嚴武欲殺杜甫事。¹¹⁹李璡，兩《唐書》各只不足五十字，可謂乏善可陳。¹²⁰李邕，《舊唐書》指其不拘細行，縱求財貨；《新唐書》雖提及〈八哀詩〉，仍以「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牛肅《紀聞》更有李邕盡取日本國使所載而沉其船事。¹²¹蘇源明與鄭虔，《舊唐書》無傳，《新唐書》稱蘇源明「切直」，稱鄭虔「悸死」。¹²²張九齡，《舊唐書》有「性頗躁急，動輒忿詈」之負評，《新唐書》本傳稱其「諤諤有大臣節」，而〈劉禹錫傳〉則載錄劉禹錫指張九齡為「忤心失恕」。¹²³由此來看顧宸評〈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

供奉之從永王璘，司戶之污祿山偽命，皆文人敗名事，使硜硜自好者處此，割席絕交，不知作幾許兩雲反覆矣。少陵當二公貶謫時，深悲極痛，至欲與同生死，古人不以成敗論人，不以急難負友，其交誼真可泣鬼神。李陵降虜，子長上前申辯，甘受蠶室之辱而不悔，〈與任少卿書〉猶刺刺為分疏，亦與少陵同一肝膽。人知龍門之史、拾遺之詩，千秋獨步，不知皆從至性絕人處，激昂慷慨、悲憤淋漓而出也。¹²⁴

¹¹⁸ 五代·劉昫：《舊唐書·李光弼傳》，卷 110，頁 3303-3311；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李光弼傳》，卷 136，頁 4583-4590。

¹¹⁹ 五代·劉昫：《舊唐書·嚴武傳》，卷 117，頁 3395-3396；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嚴武傳》，卷 129，頁 4484。

¹²⁰ 五代·劉昫：《舊唐書·讓皇帝憲子璡》，卷 95，頁 3014；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讓皇帝憲汝陽王璡》，卷 81，頁 3599。

¹²¹ 五代·劉昫：《舊唐書·文苑中李邕》，卷 190 中，頁 5039-5043；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文藝中李邕》，卷 202，頁 5754-5757。

¹²²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文藝中蘇源明》，卷 202，頁 5771-5773；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文藝中鄭虔》，卷 202，頁 5766-5767。

¹²³ 五代·劉昫：《舊唐書·張九齡傳》，卷 99，頁 3097-3100；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張九齡傳》，卷 126，頁 4424-4430。見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劉禹錫傳》，卷 168，頁 5129，所記劉禹錫之言：「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忤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

¹²⁴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5，頁 426。

把杜甫對安史之亂的李白、鄭虔，視同司馬遷對敗降的李陵，皆為至性絕人。讀〈八哀詩〉尤可見杜甫的公義私情，深悲極痛，好善懷賢，竭力為賢人良將未能盡其才尋求公道。亦可見「道大容無能」之為八詩樞紐，尤其難能而可貴。

杜甫〈八哀詩〉追憶時賢，繫心時事，憶往圖後，於古今成敗興壞之故，照見君臣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有賴於君的「用」與「信」，臣的「諫」與「忠」。亂後杜甫僻處夔州的獨存孤寂，苦於君王任非其賢，譴非其罪，材大難用，尤見為臣實難。乃能不求圓熟，不避衝突，以親歷見聞，見證一代興亡之實跡，在「往事」、「時事」與「來者」之間，有無法置身事外的同情共感，乃有情意相知的「論」，兼具詩的抒情性與史的判斷性，以深邃鏗鏘而具目擊力的詩歌語言，言人之所不能言，對未來的啟發性，發展出具有更多論述空間的公共議題，有待後來者的對話與回應。

四、易代文臣：王禹偁〈懷賢詩〉、〈五哀詩〉的無所哀

杜甫集詩人、離職官員與流離者於一身，個人經歷和國家治亂的切身碰撞，〈八哀詩〉以回望所開展的敘述視角，側寫八賢如何走過由極盛到極衰的巨變，深刻體現賢者的身世際遇與歷史命運，見聞生動豐盈，對安史之亂的觀察充滿歷史的反思。從唐到五代再入宋，杜甫與嗣作者屬於不同時代的人，經驗角度不同，所思不同，面對無力抗衡的時局變動與朝代更迭，續作者進一步要思索：以詩作傳，為什麼杜甫這樣寫，想說與沒說的是什麼，能增補、聚焦或放大的又是什麼？在探索才志之士的歷史存在上，同時對應的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既有不該忘懷的相似性，又呈現不盡相同的面貌和紋理，必然產生激盪與更多的對話。

（一）詩史交涉：王禹偁繫心五代、步武杜甫

王禹偁（954-1001）生於後周，幼時經歷「梁季亂離，舉族分散」，自述「當時

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錫之地以息幼累」。¹²⁵宋太祖趙匡胤（927-976，960 即位）時舉進士，受太宗趙炅（939-997，976 即位）、真宗趙恆（968-1022，997 即位）知遇，「三掌制誥，一入翰林」。¹²⁶直言敢諫，清楚意識到「嫉惡過當，而賢不肖太分」的天性，且又「齒少氣銳，勇於立事」，¹²⁷遭遇「八年三黜」、「任百謫而何虧」，以屈身不屈道自許。¹²⁸咸平 2 年（999）修《太祖實錄》，貶黃州（今湖北黃州），再徙蘄州（今湖北蘄春）而卒，年四十八。司馬光指其「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¹²⁹史稱「詞學敏贍，遇事敢言，憲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¹³⁰相較於杜甫親歷戰亂的奔走、陷獄與流離，王禹偁所關切的易代君臣議題，顯然有別。

宋初詩風主要有西崑體、晚唐體與白居易體三種，¹³¹杜詩在宋初尚未取得崇高的地位。¹³²太宗淳化 2 年（991）王禹偁謫商州團練副使，〈日長簡仲咸〉有「子美集開詩世界，伯陽書見道根源」，¹³³以杜詩與《老子》並列，使詩與道具有相同地位。杜甫詩世界對王禹偁的影響，淳化 3 年（992）〈吾志〉的「致君望堯舜，學業根孔姬」，¹³⁴〈黃州謝上表〉述及參修實錄「忽坐流言，不容絕筆」，感歎「讒謗之口，

¹²⁵ 宋·王禹偁：《小畜集·送鞠仲謀序》，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80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 19，頁 12。

¹²⁶ 宋·王禹偁：《小畜集·答鄭褒書》，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805 冊，卷 18，頁 14。

¹²⁷ 宋·王禹偁：《小畜集·答丁謂書》，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805 冊，卷 18，頁 22-25。

¹²⁸ 宋·王禹偁：《小畜集·三黜賦》，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80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 1，頁 10。

¹²⁹ 宋·司馬光：《涑水紀聞》（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卷 2，頁 6。

¹³⁰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王禹偁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卷 293，頁 9793-9800。王禹偁撰有《小畜集》、《小畜外集》、《五代史闕文》。

¹³¹ 元·方回：〈送羅壽可詩序〉有云：「宋刻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見氏著：《桐江續集·送羅壽可詩序》，卷 32，頁 13。

¹³² 廖美玉：《論爭與推激——學杜的多元面向》（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07-146。第三章專論唐宋人學杜。

¹³³ 宋·王禹偁：〈日長簡仲咸〉，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 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卷 65，頁 737。

¹³⁴ 宋·王禹偁：〈吾志〉，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 2 冊，卷 59，頁 658。

聖賢難逃」，而「葵藿之心未死」，¹³⁵都可見杜甫的身影。有殘句「杜甫且為詩宰相」。又作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因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相類者，咨於予，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

命屈由來道日新，詩家權柄敵陶鈞。任無功業調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閑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¹³⁶

首揭命屈道新之意旨，賦予詩家可與聖王治理天下相匹敵的權柄，使流傳千古的文學，成為士人在當代事功之外的另一種成就。蘇舜欽（1008-1048）猶感慨杜詩「不為近世所尚，墜逸過半」，¹³⁷到仁宗嘉祐4年（1059）王琪《杜工部集·後記》稱「近世學者，爭言杜詩」；¹³⁸次年宋祁、歐陽脩完成《新唐書》，於〈杜甫傳贊〉肯定杜詩「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¹³⁹數十年間，杜詩的殘膏賸馥猶足沾丐後人，充分發揮遺產效益。王禹偁以杜甫為「前身」的個人意識，擬／續作的具體實踐，顯然有助於大幅提升杜甫在宋初的詩學地位。

王禹偁繫心時事，直言敢諫，因高亢剛直而去職，在君臣議題上，延續杜甫的「將相得人」，極大強化宰相得人。太宗端拱元年（988）王禹偁直史館，〈進端拱箴表〉直言君王「志在任賢，動必師古，大開言路，精擇諫臣」，讀唐史見張蘊古（？-631）〈大寶箴〉論「為君實難」，乃「繼其美」而作〈端拱箴〉以為誡。¹⁴⁰端拱2年（989）〈待漏院記〉更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為天則，把「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宰相能做到「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則「相

¹³⁵ 宋·王禹偁：《小畜集·黃州謝上表》，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8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22，頁10-12。

¹³⁶ 宋·王禹偁：〈春居雜興〉，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5，頁733。

¹³⁷ 宋·蘇舜欽：《蘇學士文集·題杜子美別集後》，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8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13，頁21-22。

¹³⁸ 唐·杜甫著，宋·徐居仁編，宋·黃鶴補訂：《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頁23。

¹³⁹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卷201，頁5738。

¹⁴⁰ 宋·王禹偁：《小畜集·進端拱箴表》，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806冊，卷21，頁12-13。

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和，蒼生以之而富庶」，¹⁴¹君王能信任宰相所領導的賢人政治，自然會有國泰民安的太平歲月。真宗即位，王禹偁上疏言五事，其五「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¹⁴²一再申明要有知進不疑的忠良大臣，才能確保政治的清明。蘇軾（1037-1101）譽為「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¹⁴³給予高度肯定。脫脫《宋史·忠義傳序》指稱王禹偁等賢臣「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¹⁴⁴以個人言行改變五代陋習，開啟宋代重氣節之風。

在詩文創作上，王禹偁有「擬」作之文，大抵可見其「補史」、「繼美」的作意。¹⁴⁵王禹偁關心史事，尤關心近朝名賢，以詩為名賢作傳，晚年自編定《小畜集》，收錄〈懷賢詩〉三首、〈五哀詩〉五首，作於淳化2年（991）貶商州時，步武杜甫〈八哀詩〉為八位名賢作傳。前三賢為桑維翰（898-946）、李濤（898-961）、王朴（906-959），先後亡於王禹偁七歲以前；後五賢王祐（923-986）、高錫（936-985）、鄭起（？-？）、郭忠恕（？-977）、穎贇（？-？），與王禹偁生存時間相近。八賢除桑維翰、王朴亡於五代，餘皆有五代入宋的易代經歷。

（二）〈懷賢詩〉：經歷興亡的王佐才

唐亡至北宋建國之間，有後梁（907-923，兩君，十七年）、後唐（923-937，四君，十三年）、後晉（936-947，兩君，十三年）、後漢（947-951，兩君，四年）、後周（951-960，三君，十年），合稱五代（907-960），凡五十三年，十五君，可謂篡奪

¹⁴¹ 宋·王禹偁：《小畜集·待漏院記》，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805冊，卷16，頁16-18。

¹⁴²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王禹偁傳》，卷293，頁9795-9798。

¹⁴³ 宋·蘇軾：《東坡全集·王元之畫像贊並敘》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94，頁3-4。

¹⁴⁴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忠義傳》，卷446，頁13149。

¹⁴⁵ 依卜興薈〈王言、舊史與虛構——王禹偁「擬」作考〉一文分析，王禹偁《小畜集》有〈擬試內制五題〉40道，《小畜外集》有「代擬」20篇，有著眼時事的私擬「王言」，有依託舊史的「重擬」與「補亡」，也有立意的虛構。見氏著：〈王言、舊史與虛構——王禹偁「擬」作考〉，《文與哲》第41期（2022年12月），頁173-200。

相乘，時局動盪。另有十國（902-979），薛居正《舊五代史》入「列傳」，歐陽脩《新五代史》入「世家」。¹⁴⁶在政權更迭頻繁中，如何為一再經歷興亡的賢者立傳？王禹偁〈懷賢詩·并序〉云：

僕直東觀時，閱五代史，見近朝名賢立功立事者，聳慕不已，思欲形於歌詠而未遑。今待罪上洛，不與郡政，專以吟諷為事業。因賦〈懷賢詩〉三首，仍以官氏列于篇首云。¹⁴⁷

王禹偁直史館在端拱元年（988），對「五代史」（指《五代實錄》）的「近朝名賢」留下深刻印象。於貶謫地企慕「立功立事」的近代名賢，仿杜甫〈八哀詩〉取其官職為題，作〈桑維翰〉、〈李兵部濤〉、〈王樞密朴〉，三賢都是歷仕不同政權的名公重臣，分述如下：

其一，〈桑維翰〉。桑維翰佐晉高祖滅唐，仕至宰相，封魏國公，晉亡死國。¹⁴⁸全詩五十四句，開端「魏公王佐才，獨力造晉室」四句，興晉有功；「感慨會風雲，周旋居密勿」四句，成為良弼；「沉沉帷幄謀，落落政事筆」四句，卓有政績。「跋敕朝據案，論兵夜遠膝」六句，才兼將相，用人惟才，諸侯臣服；「秉鈞多事朝，綽綽有紀律」六句，比為漢張良、唐李吉甫，志向遠大。「皇天未厭亂，運去何飈欬」十句，痛惜少帝無始卒，老成疏遠，用人不當。「魏公在藩垣，上疏論得失」六句，寫上疏忠諫未果，直道見屈。「鐵馬從北來，煙塵晝蓬勃」六句，契丹攻晉，諸將投降，少帝被俘，終致亡國。「唯公獨遇害，身殞名不沒」四句，感歎功敗身亡。結語「一讀晉朝史，遺恨空鬱鬱」四句，¹⁴⁹歎惜身後子孫不振。

其二，〈李兵部濤〉。李濤為唐王室，後唐進士，又歷後晉、後漢、後周，入宋

¹⁴⁶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宋·歐陽脩：《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¹⁴⁷ 宋·王禹偁：〈懷賢詩·并序〉，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0，頁663。

¹⁴⁸ 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帝即位，拜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參見宋·薛居正：《舊五代史·晉書·桑維翰列傳》，卷89，頁1161-1169；宋·歐陽脩：《新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卷29，頁320-321。

¹⁴⁹ 宋·王禹偁：〈桑維翰〉，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0，頁663。

為兵部尚書。¹⁵⁰全詩四十六句。開端「有唐張曲江，盛名何曄曄」八句，以張九齡請誅安祿山的先覺，展開賢人不見用的論題。「兵部事晉朝，文學中科甲」六句，寫李濤在晉為文學之臣，不畏強臣，犯顏直諫。「堂堂張彥澤，反勢凌閭闔」八句，忠言直諫請誅張彥澤；「終焉念小恩，曾不顧大業」八句，忠諫不成，以致胡馬入侵。

「刺謁甚閑詳，辭氣殊不懾」八句，寫易代際遇，當年的忠言不被採納，異代後被禮遇而成為宰相。「相位席不暖，帝澤安可洽」四句，可惜天不假年，斯人云亡，終未能盡其用。結語「滑稽何足累，大節世已乏」四句，¹⁵¹對易代忠直文士的處境，要有更多同情的理解，亡國的政治責任歸屬，自然就有論究空間。

其三，〈王樞密朴〉。王朴，性剛果，後漢進士，為祕書郎，以政局亂而東歸。入晉深得世宗柴榮（921-959，954 即位）重用，累官至樞密使、檢校太保。獻〈平邊策〉，助世宗平一天下之志。詔校定曆法、考正雅樂。猝逝，年五十四。史稱「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宋興平定四方，皆如其言。歐陽脩肯定王朴材能，「不遇世宗，何所施哉」，堪為君臣相得的典範。¹⁵²全詩四十二句，開端「西樞經緯才，慷慨遇真主」十句，以「文學」之士而「未始畏疆禦」、「箕踞視太祖」，多讀古書，有浸生民、還遼古之志。「拆寺遇武宗，排佛如韓愈」六句，僧侶還俗藝禾黍，兵盛糧足。「世宗徵淮甸，委任當留務」八句，世宗外事征伐，王朴留守京師，君臣合力為太平奠基。「具瞻人有望，衰運時不與」八句，可惜天不假年，以致「云亡復殄瘁」。「世豈乏賢良，才難具文武」六句，有文武兼具之才，曆象、文章兼擅，而終歸塵土。結語「子孫雖眾多，必復事未睹」四句，¹⁵³哀子孫難以繼起，以詩為墓銘，表達追思與哀悼之意。而「云亡」、「殄瘁」也成為〈五哀詩〉的創作旨趣。

¹⁵⁰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李濤列傳》，卷 262，頁 9060-9064。

¹⁵¹ 宋·王禹偁：〈李兵部濤〉，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 2 冊，卷 60，頁 664。

¹⁵²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周書·王朴列傳》，卷 128，頁 1679-1682；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周臣傳·王朴》，卷 31，頁 341-344。

¹⁵³ 宋·王禹偁：〈王樞密朴〉，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 2 冊，卷 60，頁 664。

（三）〈五哀詩〉：對杜甫〈八哀詩〉的響應

王禹偁自許「子美是前身」，讀杜甫〈八哀詩〉而釋其義，作〈五哀詩〉以嗣之，〈序〉云：

予讀杜工部〈八哀詩〉，唯鄭廣文、蘇司業名位僅不顯者，餘多將相大臣，立功垂裕，無所哀矣。噫！子美之詩，蓋取「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已，非哀乎時也。有未列於此者，待同志而嗣之云。¹⁵⁴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出於《詩經·大雅·瞻卬》，詩人哀憫政亂民病，有賢人喪亡、國事危殆的悲憤之情。¹⁵⁵王禹偁從名位說，不論是生前職稱或死後追贈，八公都可謂顯宦，有六人更是「將相大臣，立功垂裕」，並無可哀。總題為「哀」，不在於為八公哀，而在於君王用小人而遠賢臣，賢人喪亡又與國家敗亡相伴隨而來。在朝代興亡中，身繫國家安危的賢人遭斥逐喪亡，最是可哀，期待有志之士的同感與續補，有更積極的導正意義。

王禹偁以五古作〈五哀詩〉。其一，〈故尚書兵部侍郎琅琊王公祐〉。王祐，以文章名，歷後晉、後漢、後周而入宋。太祖時，諫言「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太宗稱其「文章、清節兼著」，特拜兵部侍郎。子孫皆能其官，次子王旦（957-1017）為北宋名相。¹⁵⁶全詩七十句，開端「琅琊名父子，少孤起徒步」六句，寫王祐為琅邪王氏之後，後晉時以書見桑維翰，以藻麗見稱。「諸侯取為官，佐幕大名府」六句，寫易代更迭中的仕宦經歷，勸杜重威無反漢，坐貶沁州司戶參軍。宋太祖受禪，參與開國征戰，「六師薄孤壘，三面開生路」六句多寫其仁，因蒙蔽非罪而受貶。「折腰紆墨綬，搦翼久未舉」六句，寫從縣官到朝官

¹⁵⁴ 宋·王禹偁：〈五哀詩〉，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0，頁664-665。

¹⁵⁵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大雅·瞻卬》，卷18，頁694-697。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二語為詩之尤為痛切者：「夫賢人君子，國之棟樑；耆舊老成，邦之元氣。今元氣已損，棟樑將傾，此何如時耶？」見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69。

¹⁵⁶ 王祐入宋後歷任光州知州、殿中侍御史、知制誥、集賢院修撰、戶部員外郎，外放治理潞州、大名府尹、襄州、潭州，遷河中尹，入為左司員外郎、中書舍人、開封知府，拜兵部侍郎，月餘卒，年六十四。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見元·脫脫、阿魯圖：《宋史·王祐傳》，卷269，頁9242-9243、元·脫脫、阿魯圖：《宋史·王旦傳》，卷282，頁9542-9553。

的經歷。「攄彈志不樂，潤色才有素」六句，寫立朝不樂攄彈，而以文章見稱，掌文翰，成為朝廷重臣。「東觀秉直筆，南宮司貢部」六句，寫其書事無避忌，取材無私心，人才薈萃，蔚為嘉譽。「多才同列忌，嫉惡姦人怒」六句，寫其多才直道，遭忌出為行軍司馬，名宦流離貧窶。「文明起代邸，振拔非不遇」十二句，寫太宗召入，拜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雖「白髮已遲暮」，不改其剛直。面對小人在朝，英俊在野，依然「毀譽兩無私，華袞間蕭斧」，取孔穎達〈春秋正義序〉所云：「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¹⁵⁷稱其嚴如《春秋》。「掌選循故實，尹京恥鉤距」六句寫政績，以及晚年疾病纏身與太宗恩遇。結語「終見哲人萎，蕭蕭空壟墓」十句，寫其身後子孫多賢，以「餘慶在子孫，明明深可據」，¹⁵⁸雙拈個人德行與家聲傳衍，體現天道與吾道的相應。蘇軾即以「仁者必有後」，論王祐的「直道不容於時」，而有次子李旦相真宗，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福祿榮名達十八年，贊美其「子孫之多賢」。¹⁵⁹王禹偁寫王祐在朝代更迭、官場起伏中保有的清明，以更多的包容力，餘慶子孫而留下好家聲，對宋代重德行與家訓的士大夫文化，有一定的啟迪。

其二，〈故尚書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貶萊州司馬渤海高公錫〉。高錫，後漢進士，後周世宗時，上書請擇賢任官，分治眾職，少游宴。宋初上疏請禁兵器，不報。史稱其策慮可觀。以書干范質（911-964）得進用，以事貶萊州司馬。¹⁶⁰全詩二十句，開端「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四句，直指晚唐到宋初的文筆流散、艷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四句，指明高錫改變當時「蕩」與「野」的習氣，開啟了文質兼備的文章範式。「惜哉傷躁進，忤旨出閣下」八句，寫其在朝「兌澤連霧灑」，遭貶「移徙曾不暇」，終究死於貶所。結語「何路得自新，賁志入長夜」四句，¹⁶¹惜

¹⁵⁷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春秋正義序》，頁3-5。

¹⁵⁸ 宋·王禹偁：〈五哀詩·故尚書兵部侍郎琅琊王公祐〉，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0，頁665。

¹⁵⁹ 宋·蘇軾：《東坡全集·三槐堂銘》下冊，卷97，頁5-6。

¹⁶⁰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高錫傳》，卷269，頁9249-9251。

¹⁶¹ 宋·王禹偁：〈五哀詩·故尚書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貶萊州司馬渤海高公錫〉，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0，頁665-666。

其躁進，「人謂責太深」，感慨文章後繼無人。

其三，〈故殿中侍御史滎陽鄭公啟〉。鄭啟，後周進士，善屬文，歌詩尤清麗。以書干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宋太祖時，掌泗州市征，以刺史張延範銜怨密奏，出為河西令。史稱「負才倨傲，多所詆訐，數為群小窘辱，終亦不改」。¹⁶²全詩三十六句，開端「柱史有名跡，清才自天縱」六句，美其才華文章，尤以歌詩、文賦最為傳誦。「揚袂入澤宮，鵠心一箭中」六句，寫其入仕，恃才負氣，不拘細行以致埋沒大志。「小諫事世宗，惕惕佩光寵」八句，寫恭帝時上書宰相范質，言太祖得眾心，不宜使典禁兵，¹⁶³可惜「先見不能用」，以致曆數終歸宋。「汗漫失屠龍，接輿遂歌鳳」四句，寫入宋無所用其巧，成了歌鳳的楚狂接輿，又比為好酒的劉伶、畢卓。「神德不為嫌，優待臺諫俸」四句，寫從後周的殿中侍御史，到宋初河西令的閒散冗官。「一旦隨朝露，識者彌哀痛」四句，寫其死後「無子嗣家聲」的虛幻一生。結語「文編多散失，人口時傳誦」四句，¹⁶⁴寫其身後作品亡佚、孤塚難尋的淒然。鄭啟有才華文章，有先見不能用，身後蕭條，哀其家聲、作品兩無傳。

其四，〈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郭忠恕，後漢為佐吏，後周召為宗正丞兼國子監書學博士。宋初以酒貶乾州司戶參軍，以酒削籍。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又以酒肆言謗讟，決杖流登州，卒於途中。¹⁶⁵蘇軾稱其「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放曠岐、雍、陝、洛間，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¹⁶⁶入宋以書、畫高致揚名。¹⁶⁷全詩四十句，開端「汾陽飽經術，賦性甚坦率」六

¹⁶²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鄭起傳》，卷439，頁13010-1301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4「乾德元年」，頁38。

¹⁶³ 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1，頁2。

¹⁶⁴ 宋·王禹偁：〈五哀詩·故殿中侍御史滎陽鄭公啟〉，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0，頁666。

¹⁶⁵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郭忠恕傳》，卷442，頁13087-13088。

¹⁶⁶ 宋·蘇軾：《東坡全集·郭忠恕畫贊並敘》下冊，卷94，頁8-10。

¹⁶⁷ 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13冊，卷8，頁4：稱郭忠恕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宋·劉道醇：《宋朝名畫評》，評其「屋木樓觀一時之絕」，列為「屋木門·神品」，見氏著：《宋朝名畫評》，收入南朝齊·謝赫：《古畫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句，寫其學養、個性與才華。「總角取科名，弱冠紆纓紱」八句，為其科名早達與仕途寫照，歷經三易代的矢志與佯狂，在朝的黽勉與貶官的放逸。「滑稽東方朔，圖畫王摩詰」六句，寫其才藝，兼有東方朔與王維之長，精於古文字與博物學，書法擅長篆、隸各體。「王績醉為鄉，伯倫居無匹」六句，寫其官場失意，比為簡傲嗜酒的王績（585-644）、縱酒避世的劉伶（221-300），「俸錢乏一囊，宦路從三黜」，居官時少，白髮慵櫛。「漸老羈旅年，方見昇平日」八句，寫入宋以伎術召，鬱鬱寡合，「放口忤無貲，何門求造膝」，肆言時政得罪權貴，造膝危辭無人問津，遭譴逐而死於道中。結語「遺孤落閭閻，荒塚鳴蟋蟀」六句，¹⁶⁸哀其子孫零落，孤塚成荒，手澤難求，遺作為收藏家所寶。王禹偁以焚詩慰九原，表達同情之感，哀其生前沉淪，身後寂寥，家聲無傳。

其五，〈故太子中允知洛陽縣穎公贇〉。穎贇，善為文章，曾任博州軍事判官，太祖乾德2年（964）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拔萃登科，為秘書省著作佐郎，至太子中允，知洛陽縣。¹⁶⁹全詩三十二句，開端「洛陽富文彩，峭拔四子流」四句，寫其文筆峭拔，辭氣干雲，有堯所見姑射四子的迥然。「擢第在芸閣，言事觸冕旒」六句，寫登科後的仕宦，在朝言事被貶為地方縣令，以「道勝心無憂」、「放蕩不檢脩」見其性情。「起應賢良科，下筆不見休」四句，再以賢良科的直言極諫事，帶出被貶的久遭憂患而難有作為。「輕財糞土賤，高義雲天浮」十句，寫其輕財高義，雖室如懸磬，不改獻酬，深受英俊之士的推挽，而終究未能復起，壯志難酬，抑鬱不得志。結語「忽然為異物，寒草封一丘」八句，寫其身後困窘，家室難全，幸而「遺孫方稚齒，爽秀已迢迢」，¹⁷⁰預期可光大家聲。

年），卷3，頁474-475。

¹⁶⁸ 宋·王禹偁：〈五哀詩·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0，頁666。

¹⁶⁹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文苑一·鄭起傳》附，卷439，頁13012。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乾德二年」，頁10。

¹⁷⁰ 宋·王禹偁：〈五哀詩·故太子中允知洛陽縣穎公贇〉，收入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2冊，卷60，頁667。

（四）「易代」的君臣事跡與文士處境

「易代」的君臣關係，最是難以論斷。五代歷時五十三年，國祚最長十七年，最短四年，政權轉移又多以「禪讓」為之，文士官員在政權延續上有其重要性。毛漢光〈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觀察人物在易代時的延續現象，指出：「從中央權臣經由篡弑而改朝換代者，其人事變更較少」，「五代時由於朝代極短，官宦超過兩個朝代以上者甚多」，¹⁷¹五代文士歷仕不同朝代，可謂常態。如何看待、評論「易代」的君臣關係與士人處境？是一個新的命題。王禹偁以同歷興亡的感受，作〈懷賢詩〉與〈五哀詩〉，以「云亡復殄瘁」為切入點，關注易代之際文士仕宦的「才」與「命」，可分三端：

其一，才華與文學。〈懷賢詩〉與〈五哀詩〉所懷八賢，多非士族，主要由科舉出身，仕宦與其文章才華有關。¹⁷²桑維翰有王佐才，興晉有功，有「政事筆」，能「闡儒術」。李濤為文學之臣，有張九齡「請誅安祿山」的先覺。王朴為「文學」之士，有「西樞經緯才」，多讀古書，有浸生民、還遼古之志。王祐以文章見稱，掌文翰，多才直道，「潤色才有素」。高錫改變晚唐到宋初的文筆流散、艷冶，引導文質兼備的文章範式。鄭啟有才華文章，兼擅歌詩、文賦。郭忠恕學養、個性與才華兼具，科名早達，以才辯、圖畫、書法、文字與博物揚名。穎贇文筆峭拔，辭氣干雲。

其二，諫言與云亡。桑維翰上疏「辭切痛入骨」，忠諫未果，直道見屈，晉亡死國。李濤忠言直諫不成，易代而未能盡其用，非「腐儒」、「禮法」所能論定。王朴天不假年，是「云亡復殄瘁」的代表。高錫因躁進遭嚴譴，死於貶所。鄭啟諫言有先見而不能行，易代後徒為縱酒的閒散冗官。郭忠恕縱酒放曠，傲視權貴，肆言時

¹⁷¹ 毛漢光〈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一文統計 907-960 的五十四年間，有大唐梁唐晉漢周宋七個朝代，身歷六個朝代者 12 人，歷五朝者 21 人，歷四朝者 41 人，三朝者 55 人，二朝者 89 人。見氏著：〈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 本 2 分（1980 年 6 月），頁 233-280。

¹⁷² 陸揚〈論馮道的生涯——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一文指出：自唐末到五代，能歷仕不同朝代者，「憑藉的是文藝而非族望」。見氏著：〈論馮道的生涯——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19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87-329。

政，歷經三易代、三黜官，遭譴逐而死於道中。穎贄在朝以言事被貶，壯志難酬。惟一例外是王祐，書事無避忌，取材無私心，屢遭忌不改其剛直，深得太宗恩遇。

其三，身後與家聲。八賢中，桑維翰身後「子孫亦不振」；王朴身後子孫難以繼起；高錫文章後繼無人；鄭啟身後蕭條，家聲、作品兩無傳；郭忠恕子孫零落，身後寂寥，家聲無傳。穎贄身後困窘，家室難全，遺孫爽秀可光大家聲。惟有王祐身後子孫多賢，個人德行與家聲得以傳衍。

士人以文才顯，薛居正《舊五代史》溯自晚唐僖宗李儂（862-888，873 即位）：「自廣明（880-881）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皆有文稱。」¹⁷³因掌書檄的文職官吏需求高，出現尚文之風。耐人尋味者，八賢大抵身後蕭條，子孫無聞，並未如六朝世襲成為士族，關鍵在君臣相得者寡。惟有王祐深得太宗恩遇，身後子孫多賢，成為君臣關係的指標。而宋代重德行與家訓的士大夫文化，也由此開啟。

宋初如何看待朝代更迭頻繁的五代？王禹偁完成以詩為昔賢作傳的〈懷賢詩〉與〈五哀詩〉後，於太宗至道元年（995）任翰林學士時，重讀《五代史》而完成《五代史闕文》，〈序〉云：

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跡傳於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略，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鑒誠，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為一卷，皆聞於耆老者也。¹⁷⁴

特就君臣事跡而言，因史氏的避嫌與漏略，與傳於人口者顯有差異，乃取孔子「我猶及史之闕文」之義，補君臣后妃事跡，計後梁三人、後唐七人、後晉一人、後漢二人、後周四人，以資「善惡鑒誠」。宋·薛居正（912-981）《舊五代史》即肯定《五代史闕文》的「多舉軼事，兼駁正舊史之失，議論多可取」。¹⁷⁵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引王士禎《香祖筆記》許為「辯正精嚴，足正史官之謬」、「萬古公論」，

¹⁷³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唐書·李襲吉傳》，卷 60，頁 805。

¹⁷⁴ 宋·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序》，收入清·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40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633。

¹⁷⁵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梁書七·太祖紀第七》，卷 7，頁 110。

更進一步指出歐陽脩《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五代史闕文·後唐史·武皇》的臨薨以三矢付莊宗事，以見「當時固以信史視之」，¹⁷⁶多重認證了王禹偁對史事的辯正與議論。

杜甫〈八哀詩〉所懷時賢，有賢王、良將、良相與名士。王禹偁〈懷賢詩〉、〈五哀詩〉所懷，乃歷經更迭的文臣，有文翰之才，得君用則有治理政績，不得則以藝文揚名，形塑出以才顯的文士大夫形象。在用典上，不同於杜甫多取事義的「事典」，王禹偁多用「語典」呈現職官制度的作用。此外，少了故事性，情感與深度相形遜色。

五、不世之才：司馬光〈五哀詩〉的尤可大哀

杜甫以〈八哀詩〉為時賢作傳，以詩作史，泯滅詩／史界限。司馬光有編年史《資治通鑑》，又有個案抒懷的〈五哀詩〉，於詩／史之間自有體會。《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 23 年（前 403），命韓、趙、魏三家分晉成為戰國開端，下迄五代末葉後周世宗顯德 6 年（959）禪讓之前，不寫後周滅亡。梳理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興衰更迭，自然深切了解治亂與君臣關係。如〈唐紀三十六〉記歷仕玄、肅、代、德四朝的李泌（722-789），於肅宗至德二載（757）求去，以「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¹⁷⁷為「五不可留」，說明君殺臣的動機。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評述司馬光《資治通鑑》為「後世不可無之書」。¹⁷⁸王夫之《讀通鑑論》也指出：

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

¹⁷⁶ 宋·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收入清·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407 冊，頁 631。

¹⁷⁷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唐紀三十六·肅宗至德二載（757）》，卷 220，頁 7035-7036。

¹⁷⁸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著書之難》（臺南：唯一書業中心，1975 年），卷 21，頁 548-549。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綴言二·資治通鑑》（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 100，頁 721：直指「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¹⁷⁹

深明歷代興衰，人事臧否，君道臣誼，士乃可以行己守正、無辱不陂，而有自淑、誨人與知道之樂。以「通」之樂寫〈五哀詩〉的「尤可大哀」，既可見詩／史界限，又可提供詩／史的相互參照。

（一）鑒往資治：《資治通鑑》重事功而輕文學

司馬光生當宋朝全盛時期，歷仁宗趙禎（1010-1063，1022 即位）、英宗趙曙（1032-1067，1063 即位）、神宗趙頊（1048-1085，1067 即位）、哲宗趙煦（1077-1100，1085 即位）四君。司馬光身為新舊黨爭的核心人物，敢於直言，譽高毀重，自言「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不以祿位為榮，潔身自愛。神宗行新法，司馬光犯顏直諫，退居洛陽獨樂園十五年，專心著書。弟子劉安世（1048-1125）有「（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的理解。¹⁸⁰哲宗起為門下侍郎，拜左僕射，悉除新法，恢復舊制。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史論以天若壽司馬光，則「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再度引發「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之悲。¹⁸¹

司馬光對歷代興亡與君臣關係早有關注，〈功名論〉直指「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惟若人主「不用賢」亦難求「功業之美」，舉事例闡明：凡忠直之臣，必與姦邪為怨敵，「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惟有賢者「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方能「享其功利，收其榮名」，¹⁸²把君王的功業之美，建立在知賢而能亟用專信，良臣能獲得明主的全力支持，事功方可成。

司馬光撰史，始於英宗治平 2 年（1065）進呈《通志》，次年論編《歷代君臣事跡》，奏言編撰旨趣，在於「帝王日有萬機」，未易「徧知前世得失」，取「關國家之

¹⁷⁹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四》（臺北：里仁書局，1985 年），頁 1114。

¹⁸⁰ 宋·胡子：〈迂叟〉錄《元城先生語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 22，頁 158。

¹⁸¹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司馬光傳》，卷 336，頁 10757-10772。

¹⁸² 宋·司馬光：《傳家集（溫國文正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71，頁 1-5。

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刪去浮冗之文，「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¹⁸³是一部以帝王為聽／讀者的通史。神宗即位，以《通志》乃「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作〈序〉云：

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¹⁸⁴

熙寧 4 年（1071）司馬光因黨爭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時事，元豐 7 年（1084）完成《資治通鑑》，〈進書表〉重申「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¹⁸⁵著墨在關乎治亂興衰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戰爭，尤多寫君王賢愚與官吏良窳。

《資治通鑑》多取有資治道的「事功」，相形忽略「文學」成就。蘇軾〈司馬溫公行狀〉稱其天性正直誠信，語未嘗妄，其文「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¹⁸⁶由此來看《資治通鑑》不載屈原事，成書未久即引發爭議。劉義仲（1059-1120）《通鑑問疑》記載其父劉恕（1032-1078）與司馬光的往還論難，〈結語〉特就司馬光筆削的「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對協修的范祖禹（1041-1098）提出疑問，第一件事即為屈原：

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乃削去屈原投汨羅、撰〈離騷〉等事。歷代儒林、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¹⁸⁷

直指《資治通鑑》削去屈原事為「掩日月之光」。邵博（？-1158）《聞見後錄》引述司馬光對范祖禹說：「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雖肯定司馬光「欲士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的用意，仍認為「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離

¹⁸³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08「治平三年」，頁 3-4。

¹⁸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御製序》，頁 33。

¹⁸⁵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進書表》，頁 9607-9608。

¹⁸⁶ 宋·蘇軾：《東坡全集》下冊，卷 90，頁 1-29。

¹⁸⁷ 宋·劉義仲：《通鑑問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5。劉恕、范祖禹都參與了《資治通鑑》的編纂。

騷〉非空言，呼應劉義仲的質疑，認為司馬光「當有深識」，可惜無解。¹⁸⁸此後學者，南宋有替司馬光辯解者，¹⁸⁹有代為增補者。¹⁹⁰顧炎武《日知錄》回應李因篤（1631-1692）的「《通鑑》不載文人」，舉唐文宗李昂（809-840，827 在位）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丁居晦，丁居晦答以「此非君上要知之事」，直指「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¹⁹¹凸顯《通鑑》以君王為讀者，寫君王要知道之事。按司馬遷《史記》於〈屈原列傳〉記載了屈原諫懷王殺張儀事，又勸懷王不可入秦，而〈楚世家〉則以昭睢諫懷王毋往會秦昭王。《資治通鑑》依〈楚世家〉將諫懷王入秦事歸諸昭睢。而〈五哀詩〉則取〈屈原列傳〉，以屈原冠首，成為五人中惟一未見於《資治通鑑》者。可見詩／史各有其預設讀者，檢視〈五哀詩〉與史傳、《資治通鑑》，以見詩／史的界分、參照與呼應。

（二）利口亂信：〈五哀詩〉的云亡與殄瘁

王禹偁〈五哀詩〉的「云亡」之悲，因五代政權轉移多以「禪讓」為之，文翰需求使得五公歷仕多朝，無形中削弱了「邦國殄瘁」之哀。司馬光以史為鑑，從邦國治亂的角度，回應杜甫〈八哀詩〉的「將相得人」，把杜甫複雜難言的心事，化約成有大才而困於讒者，嘗試在繁味的君臣關係中，尋繹事理分明處。司馬光〈五哀詩并序〉云：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讒之為害，不可一二數也。聊觀戰國以來，楚之屈原，趙之李牧，漢之晁錯、馬援，齊之斛律光，皆負不世之才，竭忠於

¹⁸⁸ 宋·邵博：《聞見後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0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10，頁 6。

¹⁸⁹ 宋·費袞（？-？，紹熙（1190-1194）時人）指屈原雖以忠見放，然「行吟悲懣，形於色詞」，「非一飯不忘君之誼」，沈淵「非聖人之中道」，司馬光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自然不取屈原。見氏著：《梁溪漫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5「《通鑑》不載〈離騷〉」，頁 13。

¹⁹⁰ 宋·朱熹：《御批資治通鑑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1，頁 18：稱屈原「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睠顧不忘」，作〈離騷〉「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子蘭又譖之于頃襄王，遷之於江南，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¹⁹¹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卷 26「通鑑不載文人」，頁 764-765。

上，然卒困於讒，不能自脫，流亡不得其所而死。或者國隨以丘墟，此其尤可大哀者也。因即其事作〈五哀詩〉，且以警後世云。¹⁹²

引《論語》的「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說明讒之為害，又見《孟子》引孔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¹⁹³舉歷史故實為例，有具不世之才的屈平、李牧、晁錯、馬援、斛律光，聚焦在竭忠而困於讒，不能自脫以致死不得其所，乃至國亡。把「云亡」、「殄瘁」的大哀，歸於佞言利口的亂義亂信，以感性的「警後世」呼應《資治通鑑》的「有資治道」。

司馬光以五律作〈五哀詩〉。其一，〈屈平〉。屈原（約前 340-前 278）生當戰國時代，依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屈原為楚懷王左徒，「明於治亂，嫺於辭令」，能與王圖議國事，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因讒而為懷王所疏，「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作〈離騷〉。屢諫，懷王終不悟而客死於秦，司馬遷感歎懷王「不知忠臣之分」、「不知人之禍」。頃襄王即位，因讒又遷，乃投江死，楚終為秦滅。司馬遷以為其志潔，其行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¹⁹⁴司馬光櫟括為詩，略去屈原的政事，首聯「白玉徒為潔，幽蘭未謂芳」，以「徒」、「未」減弱對屈原志潔行廉的頌美。頷聯「窮羞事令尹，疏不忘懷王」，寫屈原不事邪曲，忠於一人。頸聯「冤骨銷寒渚，忠魂失舊鄉」，寫其忠而含冤，客死異鄉。尾聯「空餘楚辭在，猶與日爭光」，¹⁹⁵用「空」呼應「徒」、「未」，把屈原與日月爭光的志行，只歸於文學。司馬光〈答張尉來書〉以屈原為騷及繼作者「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為」，從明主求賢的角度，直指「不可遽為」，¹⁹⁶把屈騷歸於文人失時不得志之作，自是不符合「有資治道」的《通鑑》旨趣。司馬光〈醉〉詩云：「厚於太古暖於春，耳目無營見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當年不作獨醒人。」¹⁹⁷恰可見司馬光與屈平在性情上

¹⁹²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司馬光五》第9冊，卷502，頁6087-6088。

¹⁹³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陽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卷17，頁157。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盡心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卷14，頁263。

¹⁹⁴ 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卷84，頁2481-2491。

¹⁹⁵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司馬光五》第9冊，卷502，頁6088。

¹⁹⁶ 宋·司馬光：《傳家集（溫國文正公文集）》，卷61，頁17-18。

¹⁹⁷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司馬光六》第9冊，卷503，頁6107。

的大異其趣。

其二，〈李牧〉。李牧（？-前 229）趙國良將，厚遇戰士，善用兵，大破匈奴使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南距韓、魏，屢敗秦軍，封武安君。秦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誣指李牧欲反，趙王使人斬殺牧。秦乃大破邯鄲，趙王被虜，趙滅。¹⁹⁸司馬遷《史記》記載馮唐對漢文帝劉恆（前 220-前 157，前 180 即位）分析李牧的成功，乃在「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趙幾霸；及趙王遷立，用讒誅李牧，卒為秦所滅。¹⁹⁹司馬光以詩寫李牧，首聯「椎牛饗壯士，拔距養奇材」，概括李牧有養兵練武之才。頷聯「虜帳方驚避，秦金已闇來」，略去赫赫戰功，逕寫功著而讒毀隨之。頸聯「旌旗移幕府，荊棘蔓叢臺」急轉直下，李牧因讒而死，趙國隨即敗亡，是典型的云亡、殄瘁。尾聯「部曲依稀在，猶能話郭開」，²⁰⁰假將士之口，把亡國歸責於受金進讒的嬖臣郭開。司馬光在詩中但寫李牧有不世之才，感慨秦人反間以致都城為廢墟，既略去李牧所以成功，又不言趙王信讒以致敗亡。《資治通鑑》則假子嬰諫秦二世，直指「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以致「亡國」，²⁰¹可見司馬光以史「資治道」、以詩「警後世」的界分，乃在預設了史與詩的不同讀者，而指引向君／臣的各有分際。

其三〈晁錯〉。西漢·晁錯（前 200-前 154），生當文景之治，明於世務刑名，善策論，於〈賢良文學策問〉的〈對策〉強調「臨制臣下」之術，以致「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劉啟（前 188-前 141，前 157 即位）時貴幸用事，「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議以適罰，侵削諸侯」，以尊天子、安宗廟。景帝下詔削吳二郡，吳、楚反，袁盎密陳「獨急斬錯以謝吳」，景帝以「吾不愛一人謝天下」，斬晁錯。晁錯死，鄧公（？-前 133）見上言誅錯「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

¹⁹⁸ 漢·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附李牧列傳》，卷 81，頁 2449-2452。宋·司馬光：《資治通鑑·秦紀一·始皇帝 3 年（前 244）》，卷 6，頁 205-207；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始皇帝 18 年（前 229）》卷 6，頁 223。

¹⁹⁹ 漢·司馬遷：《史記·馮唐列傳》，卷 102，頁 2757-2761

²⁰⁰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司馬光五》第 9 冊，卷 502，頁 6088。

²⁰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秦紀二·始皇帝 37 年（前 210）》，卷 7，頁 251。

復言」，申明「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景帝有「吾亦恨之」之悔。惟《史記》多負評，直指「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本傳更指其擅權，「欲報私讎，反以亡軀」。²⁰²《漢書》本傳贊則稱其「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存錄晁錯論政文章八篇。²⁰³司馬光以史傳為基準，略過文學，直接寫結局，首聯「人主恩猶盛，讒夫弄舌端」，君恩與讒言並見，即《資治通鑑》所載上令丞相陶青等劾奏錯「無臣子禮，大逆無道」等事。頷聯「旋聞就斧質，不得解衣冠」，晁錯被以欺騙的手法在執行公務中斬殺，即《資治通鑑》所載「上使中尉召錯，絀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頸聯「反虜齒纔冷，謀臣心盡寒」，錯之死，可謂親痛仇快。尾聯「晁宗噍類盡，漢室泰山安」，²⁰⁴更以錯父有「劉氏安」、「鼂氏危」的先見，感慨代君受過的謀臣之悲。《資治通鑑》於〈漢紀十五〉引李德裕（787-849）論「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舉例「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為例，引劉向言「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²⁰⁵把晁錯的悲劇，指向景帝的狐疑之心所召來的讒言。

其四〈馬伏波〉。東漢·馬援（前 14-49），有大才，以「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馬革裹屍」自許。王莽時，為西州隗囂與蜀帝公孫述所重，光武帝劉秀（前 5-57，25 即位）謂其「遨遊二帝閒」，援以「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為東漢開國功臣。馬援善兵策，光武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平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立銅柱為漢極界，「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²⁰² 晁錯，《史記》、《漢書》、《資治通鑑》作鼂錯。漢·司馬遷：《史記·孝景本紀》，卷 11，頁 449；漢·司馬遷：《史記·禮書一》，卷 23，頁 1160；漢·司馬遷：《史記·袁盎晁錯列傳》，卷 101，頁 2737-2749。

²⁰³ 八篇為〈賢良文學策問〉、〈論太子宜知術數疏〉、〈言兵事疏〉、〈論守備邊塞疏〉、〈論募民徙塞下宜為什伍疏〉、〈論貴粟疏〉與〈入粟郡縣疏〉，分見漢·班固：《漢書·食貨志》，卷 24，頁 1130-1135；漢·班固：《漢書·袁盎鼂錯傳》，卷 49，頁 2267-2303。

²⁰⁴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司馬光五》第 9 冊，卷 502，頁 6088。

²⁰⁵ 分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漢紀八·景帝前 3 年（前 254）》，卷 16，頁 521-523；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漢紀十五·昭帝元鳳元年（前 80）》，卷 23，頁 763-764。

有〈誠兄子嚴、敦書〉，以「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為大惡。年六十二自請征武陵五溪蠻夷，病卒。馬援嘗從交趾載薏苡實以還，卒後有上書譖為明珠文犀，帝怒。妻孥惶懼，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梁松構陷書，方知所坐，凡六上書訴冤，然後得葬。朱勃上書為馬援伸冤，有「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史論稱其「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²⁰⁶司馬光以史傳為基準，略去開國的許多事功，首聯「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取平定交趾以置郡縣事。頷聯「天涯柱分界，徼外貢輸金」，寫立銅柱為南界事。頸聯「坐失奸臣意，誰明報國心」，寫一心報國，不敵奸臣讒言。尾聯「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烟深」，²⁰⁷感慨南征病死軍中的忠勇，卻因讒言而不得安葬。前四句聚焦南定交趾，極大擴展漢朝版圖；後四句寫身死蒙冤，見帝王信任度的不足依賴。與《資治通鑑》詳細記載馬援高齡請征五溪與卒後遭構陷事，引誠兄子書與朱勃上書，可相呼應。

其五，〈斛律丞相〉。斛律光（515-572）為北朝將相，治軍嚴明，東魏（534-550）時有「射鵰手」之號，北齊受禪，多次擊敗北周，拜左丞相、咸陽王。後主高緯（556-577，565即位）性怯懦多疑，祖珽、穆提婆以事積怨斛律光，北周使人作謠言，祖珽等人於涼風堂誘殺斛律光，詔稱光謀反，盡滅其族。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560即位）聞光死，滅北齊，追贈斛律光為上柱國、崇國公，言「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史論稱其「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卓有戰績，可惜「世亂才勝」、「主暗時艱」，引趙將李牧「北翦胡寇，西卻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直指「議誅光者」，有如秦行反間的「同術而同亡」，「內令諸將

²⁰⁶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馬援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24，頁827-852。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漢紀三十二·建武元年（25）》，卷40，頁1288-1289；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漢紀三十六·光武皇帝下建武24年（48）》，卷44，頁1407-1412。

²⁰⁷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司馬光五》第9冊，卷502，頁6088。

解體，外為強鄰報仇」，宜引為「深戒」，〈贊〉許其忠壯，居將相高位，「迫此威名，易興讒謗」，²⁰⁸可謂感慨繫之。顏之推（531-591）以斛律光為「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直指「國之存亡，係其生死」。²⁰⁹司馬光以史傳為基準，略過斛律光結髮從軍，未嘗敗北的赫赫戰功，首聯「君臣日荒宴，歌舞諱言愁」，寫高緯與佞臣荒淫無道，縱情享樂。頷聯「老相猶當國，彊鄰不敢謀」，申明朝政賴有斛律光，方得以抵禦北周。頸聯「謠言雖未出，奸謗已先流」，敵國謠言竟成為奸謗的載體，即史論所稱議誅光者不異反間者。尾聯「誰察忠臣意，通宵抱膝憂」，²¹⁰感慨主暗時艱，同理忠臣憂危之心。《資治通鑑》綜整史傳，對北周謠言的不起作用，特別從人品上寫「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表疏務從省實，行兵常為士卒先，未嘗妄殺有罪等，深得軍心，鄰敵憚畏。寫涼風堂撲殺事，斛律光語「我不負國家」。光死，下詔稱其欲反，簿錄其家，惟「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簿錄者以為「賢宰相」。²¹¹詩與史互文，可見深意。

（三）君臣之間：得君功成與信讒亡國

君臣際會難得，古來乃多懷才不遇、歎老嗟卑者。即令得遇明主，又以才高毀至，含冤遭貶，求一個能盡忠竭志的境遇竟不可得。依〈五哀詩并序〉，司馬光應是受到貞觀之治的啟發。《貞觀政要》記載太宗綜合歷史觀察，直言「讒佞之徒，皆國之蠱賊」，一旦遇到「暗主庸君」，必致忠臣「泣血銜冤」，特別舉斛律光為例：「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斫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引古人的「代亂則讒勝」，與史書的「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把防微杜漸，絕讒構之端，視為君、臣的共同目標。魏徵即引孔子的「惡利口之覆邦家」，以「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

²⁰⁸ 唐·李百藥：《北齊書·斛律光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卷17，頁222-230。

²⁰⁹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慕賢第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27。

²¹⁰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司馬光五》第9冊，卷502，頁6088。

²¹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陳紀五·高宗太建4年（572）》，卷171，頁5307-5310。

露」，使君王成為當責者。²¹²太宗認為「杜讒邪」有賴明君、直臣的共同努力，而魏徵則從云亡、殄瘁揭示君王的終極責任。太宗與魏徵就「君臣」議題展開的深度對話，尋求明君與直臣之間的平衡，讒譖成為邦國興亡的討論重點。

司馬光繼魏徵之後，一再取孔子的利口覆邦家為切入點，²¹³〈五哀詩〉具體揀擇負不世之才者，或為開國功臣，或守邊禦敵，或拯救危亡，卻因功高震主，忤逆上意，卒困於讒，身死、國亡，以為大哀。首列屈原，明於治亂，因讒而遭流放，不得其所而死，雖有〈離騷〉可與日月爭光，司馬光以為非屈原所願。其二李牧，有君王足夠的信任，「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故能竭智盡忠；一旦佞幸之徒受賄，讒言入君耳，同樣是不得其所而死。其三晁錯，為國遠慮，君恩與讒言並至，代君受過，被誘殺於上朝途中，含冤而卒。其四馬援，為東漢開國功臣，論兵合君意，開疆拓土，奮不顧身，而身死蒙冤，不得安葬。其五斛律光，才兼將相，戮力守護邦國，主暗時艱，讒謗構陷，無罪被誅，詔以謀反滅族，邦國以亡，歷歷印證了《詩》的「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五哀詩〉採五言近體，限於字數與格律，乃聚焦在讒謗亡身，略去事跡，依年代先後，連章詩的緊密性略有不足。就群傳而言，涉及的君臣論題，可得下列數端：

其一：五人的共同點乃皆負不世之才，也都未能自免於讒隙，卒以讒謗而亡或亡而不敢歸葬。差異處有三，一是事功，除屈原外，有四人皆曾得君王賞識而卓有事功；二是云亡，有四人屬於死不得其所，馬援謗生死後，以馬革裹屍自許，死於南征，難謂不得其所；三是殄瘁，有三人身死國滅，而晁錯、馬援則是死後邦國以安。

其二：從君王說，有三位亡國之君，信讒誅忠良以致亡國，有權當責，在亡國

²¹² 唐·吳兢：《貞觀政要·杜讒邪第二十三》，卷6，頁310-311。

²¹³ 司馬光為神宗讀《資治通鑑》的張釋之論虎圈畜夫「謀諛利口捷給」，即引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申明：「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10「熙寧三年」，頁30。

的責任歸屬上自是難辭其咎。另外二位君王，一是治世明君西漢景帝，一是開啟東漢的光武帝，二帝非不明事理者，何以坐視悲劇發生？觸及到群臣的權力制衡，關乎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提供了「退功臣以止戈」的政治思維。

其三：就臣而言，以未被寫入《資治通鑑》的屈原冠首，除了感歎「空餘楚辭在」，屈原既無法向扭曲的政治現實妥協，又看不到轉變的絕望，把「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怨，盡情傾洩在文章中。班固已指摘其「露才揚己」、「責數懷王」、「忿懟不容」，²¹⁴顏之推更直指屈原「顯暴君過」。²¹⁵屈原以死亡保全自身的清白，留下可與日月爭光的文章，成全了自己，也凸顯了信讒害忠以致亡國的君過。其次李牧，以賞賜決於外而得盡其智能，及其功著而讒毀隨之。至於晁錯與馬援，一善疏論，一善治軍，分別為邦國的文治、武功立下大功，同樣都為邦國安定而成為犧牲品。斛律光兼具將相之才，主暗時艱，位高謗興，無罪被誅，族滅國亡，是典型的云亡殄瘁。

宋太祖屢建戰功，黃袍加身，結束了五代十國的紛亂局面，以「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藉飲酒使石守信等功臣名將釋去兵權，²¹⁶偃武修文，《宋史》稱其「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²¹⁷開啟尚文之風，技巧性地退功臣以止戈。又傳立誓碑明訂「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²¹⁸優禮士大夫，保障言官。程頤（1033-1107）解〈堯典〉的「克明俊德」，闡明堯之治乃帝王之道，擇任賢俊，「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²¹⁹君臣同治天下成為指標。由此而發展的君臣倫理，司馬光《稽古錄》直言「國之治亂，盡在人君」，而人君之道在於用人，能做到「邪者日毀之而不聽」，則大功可成，²²⁰揭示明君之道，在使讒佞奸計不得行。司馬光更是躬行臣道，

²¹⁴ 姜亮夫：〈第一輯注類〉，《楚辭書目五種》（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頁8-9。

²¹⁵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第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48冊，頁43。

²¹⁶ 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1，頁6。

²¹⁷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文苑傳·序》，卷439，頁12997。

²¹⁸ 宋·陸游：《避暑漫抄》，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第72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6。

²¹⁹ 宋·程頤、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卷2伊川先生《書解》，頁1035。

²²⁰ 宋·司馬光：《稽古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12冊，卷16，頁1-6。

徹底奉行尊君模式，在朝犯顏直諫，退居不言時政，黃庭堅許為「天下士」，²²¹長安石工猶知「海內稱其正直」，²²²政治權力無法決定個人的榮譽，以終身忠信清廉而得以對抗讒謗，展示了君臣關係的道德導向。

六、結語

杜甫〈八哀詩〉寫於僻遠的夔州，在漂泊中「每依北斗望京華」的心之所繫，以五古連章的詩歌體式為時賢作傳，記憶身在局中的目睹耳聞，把時賢事跡擺在攸關興衰的歷史事件中，形構出由極盛到極衰的轉折，成為「詩史」。哲人已逝，戰亂未息，個人際遇與國家局勢的交涉互動，匯流成不可抑的哀思，無畏地碰觸許多難以直言的複雜政治議題，兼具紀實與闡釋的性質，又以更多對話凝聚同情共感，開啟更多不同面向，大幅度擴充詩歌所能夠承載的意義。這些意義能否藉由詩歌，有效地傳達到京城，都可見杜甫尋求突破現狀、展望未來的深切思考。

宋人對杜甫〈八哀詩〉的閱讀與嗣作，引導出更多可共同關注的君臣論述與歷史議題。由五代入宋的王禹偁，關注易代文臣的處境，先後有五古〈懷賢詩〉三首與〈五哀詩〉的嗣作，回應並展開與杜甫的對話。身處治世的司馬光，以五律作〈五哀詩〉，關注困於讒言的不世之才，因聚焦而更見分明，卻也不免遺落了論題的複雜性。以「哀」為題為賢者作傳的三組詩，三位書寫者從盛唐到北宋治世，兼具士／仕／詩人身分，或兼學者、史家；二十一位被書寫者從戰國到五代十國，有將、相與文吏，關注議題涵蓋人事、時事與史事。如何捕捉才志之士生命的樣態，以詩召喚過去，讓一個因死亡而消逝的場域得以重新被審視，讓個體記憶成為讀者共有的歷史，共同思考在云亡與殄瘁之間，如何賦予新的詮釋。創作者與嗣作者的先後呼

²²¹ 宋·黃庭堅：《山谷集·山谷外集·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1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年），卷9，頁19-20。

²²²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司馬光傳》，卷336，頁10757-10772。

應，除了詩學上的意義，具持續開展性的論題有三：

（一）亙古同哀：不可磨滅的戰亂傷痛與云亡殄瘁

安史亂後十年猶是「盜賊未息」，杜甫目睹兵凶戰危的喪亡慘劇，以〈八哀詩〉深切省思戰亂可避免而終未能避免，記憶同行者的生命故事，毋忘戰亂傷亡者的哀痛。安史亂後的藩鎮擁兵自重，延續成唐亡後的五代十國，王禹偁以《五代史闕文》補君臣后妃事跡，以〈懷賢詩〉、〈五哀詩〉寫五代政權轉移中的文吏。司馬光《資治通鑑》始於戰國，終於五代；〈五哀詩〉寫戰國、西漢七王之亂、東漢開國征戰、十國的將相。伴隨戰爭成敗、邦國興亡的朝中爭權，導致無辜大臣的忠而被謗，無數百姓的流離喪亡，是「哀」的共同源頭。

被書寫者的死亡結局，屈原選擇以生命捍衛自我的尊嚴與清白，晁錯、馬援為國家的穩定而被君王拋棄。尤以高齡七十被杖斃的李邕，嚴整上朝被當市腰斬的晁錯，君令何以如此暴力殘忍？書寫者不以政權更迭的成王敗寇論，共譜負大才而未能盡其用者的悲歌，既為云亡、殄瘁而哀，也為代君受死、成全治世者哀。書寫者對被書寫者的同情共感，彷彿跟著死了一次又一次，終難釋懷的亙古之哀，也為活著的人留下深刻的哀思與反省。

（二）事功與文學：詩史交涉的視域轉換

史書多記事功，間及與政治有關的言論。杜甫於亂離之後，著力以詩作史，〈八哀詩〉為有才而未能盡其用者畫像，融時事變化與個人生死際遇、性情事功而為一，兼及藝文成就，形塑出有志有道者的生命共相，忠義之外有情義，政壇之外有文場騷壇。詩中摻雜敘事、議論與情感，本極難工難讀，且又期於必傳，以待知者的繼起與回響。王禹偁嗣作〈懷賢詩〉、〈五哀詩〉，為近代人作傳，取亂世中的王佐才，以文才顯，忠諫未果，壯志難酬，關注其身後與家聲。司馬光《資治通鑑》多取事功，不載屈原事；〈五哀詩〉取史事為古人哀，以屈原冠首，又把屈原與日月爭光的〈離騷〉，只歸於文人失時不得志之作。

杜甫為時賢作傳，至宋已成「歷史」。宋祁《新唐書·文藝傳》於李邕提及〈八

哀詩》，又增加劉昫《舊唐書》所無的蘇源明與鄭虔傳。王禹偁有《五代史闕文》以資「善惡鑒誠」，又讀〈八哀詩〉而自許為同志，引《詩》的「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作〈懷賢詩〉、〈五哀詩〉以待同志嗣作。司馬光有《資治通鑑》以資「治道」，又作〈五哀詩〉「以警後世」，成為杜甫所期待的讀者。而脫脫《宋史》又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天不壽司馬光，使「靖康之變」（1126）未能少緩。詩與史的相互參證，諸多難為用的才大志高者，乃得以不被遺忘。

（三）堯舜其君：思考君與臣的相互關聯

古來仁人志士，或懷才不遇，或忠而被謗見疑，「魚水君臣」成了唐宋君臣共同的夢。杜甫以「致君堯舜」呼應太宗的君臣觀，〈八哀詩〉揀選八位時賢，有盛世賢王、良相，有平亂良將，有時運不齊的名士，為功高盛名而招忌者討一個公道，于不可說中說話，以「道大容無能」為核心，取「難進而易退」的「若無能」者，闡發大唐從極盛到極衰的轉折關鍵，志在扶顛籌策，謀求長治久安，有必不可遺忘之深意。

王禹偁受太宗、真宗知遇，三掌制誥，一入翰林，以直言敢諫，八年三黜，慨歎「讒謗之口，聖賢難逃」。〈懷賢詩〉、〈五哀詩〉寫亂世中以才顯的文士，得君用則有治理政績，不得則以藝文揚名，特別是在朝代興亡中，諫言與云亡的相伴隨而生，最是可哀。司馬光〈五哀詩〉聚焦在竭忠而困於讒的不世之才，把云亡殄瘁的大哀，歸於佞言利口的亂義亂信，從歷史故實歸納出得君功成與讒佞亡國。信讒誅忠良以致亡國，君王自是有權當責；即令有漢景、光武之治世明君，仍不免為邦國安定與權力制衡而誅退功臣。屈原的顯暴君過，李牧、斛律光的功著位高而謗興。君／臣的相互關聯與各有分際，是君臣無可迴避的共通命題。

以詩作傳，不在史料的完整性，而在作者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與敘述技巧，兼具濃厚的歷史感與生命感。三組詩的作者，各自經歷了安史之亂、五代入宋與新舊黨爭。杜甫為亂世正色立朝而才大難用者哀，引發王禹偁「無所哀」與司馬光「尤可大哀」的思辨。同是以「哀」為題，杜甫望向未來的高瞻遠矚，王禹偁超越興亡

的卓然自立，司馬光謹守禮法的潔身勤學，顯現在創作旨趣上的承續與對話，開展出的更多論題，諸如唐宋變革的再審視，士大夫文化的形塑等，值得持續關注。

建構文學系統樹，是一件重大的學術工程。面對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個人與環境諸多複雜因素，系統樹的觀念，有助於打破傳統文學史的框架，重構詩學譜系的發展脈絡與詩人關係。數位人文與 AI 工具技術的蓬勃發展，優勢在於處理與運算大量文本數據，繪製成可視化的文學系統樹圖譜；惟如何避免文本分割與大數據判讀的誤解，關鍵仍在更多個案研究的專業驗證與互為作用。

徵引文獻

一、古籍文獻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漢·王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

晉·陸機撰，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南朝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

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年。

唐·李百藥：《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唐·吳兢：《貞觀政要》，臺北：宏業書局，1990年。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唐·杜甫著，宋·魯豈編次，宋·蔡夢弼會箋：《草堂會箋（千家注杜詩）》，

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

唐·杜甫著，宋·徐居仁編，宋·黃鶴補訂：《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臺北：大通書局，1974 年。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唐·孟棻：《本事詩》，收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

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

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

*宋·王禹偁：《小畜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802、805、8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宋·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收入清·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明倫出版社，1975 年。

*宋·司馬光：《傳家集（溫國文正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宋·司馬光：《稽古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31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宋·司馬光：《涑水紀聞》，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宋·朱熹：《御批資治通鑑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宋·宋祁、歐陽脩等合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

宋·邵博：《聞見後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0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

宋·洪邁：《容齋續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 宋·陸游：《避暑漫抄》，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
- 宋·黃庭堅：《山谷集·山谷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1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年。
- 宋·費袞：《梁溪漫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6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趙明誠：《金石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6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宋·歐陽脩：《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宋·劉義仲：《通鑑問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68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 宋·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收入南朝齊·謝赫《古畫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宋·蘇軾：《東坡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蘇舜欽：《蘇學士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8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
- 元·方回：《桐江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9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元·文天祥：《文文山全集·集杜詩》，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 明·王嗣爽：《杜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
-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清·梁運昌：《杜園說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清·蔣驥撰：《山帶閣注楚辭》，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

*清·盧世淮：《讀杜私言》，見王學泰編纂：《盧世淮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

清·盧元昌：《杜詩闡》，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南：唯一書業中心，1975年。

二、今人論著

卜興蕾：〈王言、舊史與虛構——王禹偁「擬」作考〉，《文與哲》第41期（2022年12月），頁173-200。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方瑜：《杜甫夔州詩析論》，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毛漢光：〈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本2分（1980年6月），頁233-280。

柯慶明：〈「哀」「弔」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191-238。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陳尚君：〈鄭虔墓誌考釋〉，《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315-334。

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卷第1期（1998年3月），頁1-43。

陸揚：〈論馮道的生涯——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87-329。

程千帆、莫礪鋒、張宏生：《被開拓的詩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廖美玉：《杜甫連章詩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

廖美玉：〈杜甫家族記憶中的兩性典範與生存感知——兼論父黨、母黨與妻黨的大家族觀〉，《成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3月），頁1-42。

* 廖美玉：《論爭與推激——學杜的多元面向》，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日〕川合康三：〈唐宋詩學的系統樹〉，《成大中文學報》第90期（2025年9月），頁1-20。

*〔美〕潘格瑞：〈歷史的渠道：杜甫夔州詩的紀念與溝通〉，收入田曉菲主編，劉倩等譯：《九家讀杜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頁72-9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Tang] Du Fu, [Qing] Qiu Zhao Ao annot., *Du Shi Xiang Zhu* [An Annotations on Du Fu's Poems] (Taipei: Li Ren Book Company, 1980).
- Gregory Nagy, "Channels of History: Commem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Du Fu's Kui Zhou Poems", in Tian Xiao Fei ed., trans. Liu Qian et al., *Jiu Jia Du Du Shi* [Nine Scholars Read Du Fu's Poem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2), pp. 72-99.
- Kawai Kozo, "The Phylogenetic Tree of Tang and Song Poetics",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90 (Sep. 2025), pp. 1-20.
- Liao Mei Yu, *Lun Zheng Yu Tui Ji - Xue Du De Duo Yuan Mian Xiang* [Debate and Stimulus: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Studying Du Fu]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Co., 2020).
- [Qing] Lu Shi Jue, *Du Du Si Yan* [Private Remarks on Reading Du Fu], Wang Xue Tai ed., *Lu Shi Jue Shi Hua* [Lu Shijue's Remarks on Poetry], included in Wu Wen Zhi ed., *Ming Shi Hua Quan Bian* [Complete Compilation of Ming Poetry]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1997).
- Mao Han Kuang, "Political Continuity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the Five Dynasti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1:2 (Jun. 1980), pp. 233-280.
- [Song] Sim Ma Guang, *Zi Zhi Tong 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Taipei: Ming Lun Publishing House, 1975).
- [Song] Sim Ma Guang, *Chuan Jia Ji (Wen Guo Wen Zheng Gong Wen Ji)* [Collected Works of Wen Zheng Gong of the State of Wen]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 [Song] Wang Yu Cheng, *Xiao Chu Ji*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Yu Cheng], in *Si Bu Cong Kan Chu Bian*, Ji Collection, Vol. 802, 805, 806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 [Song] Wang Yu Cheng, *Wu Dai Shi Que Wen* [Suppleme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Qing] Yong Rong and Ji Yun et al.,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